

新视界

NEW VISION

学术讲堂

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 P01

学术论文

自治、族群-区域联邦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 P17

国关人物

斯坦利·霍夫曼 P31

他山之石

基于问题式学习与公民参与 P37

迎新特辑

..... P50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编者的话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又迎来了新的学期。

伴随着天高气爽的金秋，伴随着瓜果飘香的九月，新一期的《新视界》也翩然而至。热热闹闹的开学季，南开园里又迎来了一批新鲜血液，面对大学新的挑战，在这个九月《新视界》特别为你们推出了“迎新特辑”这一栏目，希望学姐学长们的经验分享，让你们能够更好更快的适应大学新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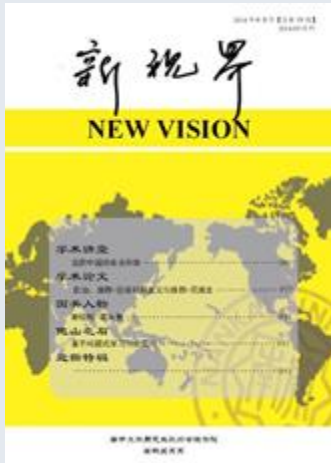
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的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学术讲堂”中，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唐永胜教授从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三个角度向我们阐释了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以尊重的角度分析大国关系；这次的“国关人物”是政府间主义的创立者与代表人物之一：斯坦利·霍夫曼；“他山之石”则翻译了一篇转移公共政策教育的学习焦点的文章，内容详实，条理清晰；“海外国关人”则刊登了学长在赴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的留学经历；“英采飞扬”探讨了叙利亚等问题；“新书架”介绍了关于国际法内容的书籍……

愿《新视界》陪伴南开过关人每一个春夏秋冬，愿拥有想法和创意的你们加入其中。《新视界》是一个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平台，它规范的学术研究以及对自由的文字表达，都可以让你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国关学界，还是我们周边小事，你可以选择成为看客，也可以选择成为现场聆听记录者，或者还可以选择美编、排版，让你的想法成为现实，让你的想法成为墨香。最重要的是，《新视界》提供的是一个实现舞台，是一个自由空间。它不仅能够为同学提供“新的视界”，更能为我们青春岁月留下美好记忆。

真诚欢迎每一位同学加入《新视界》，一起用你的“视界”感染我们的世界！

刘芮宁敬上

2014年9月7日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主办



2014 年秋季号
【总第 19 期】
2014.09 出刊

编辑部主任兼主编：刘芮宁

本期执行主编：于凯玥

副主编：刘 志

编辑部成员：

程 康 董柞壮 高振华

郭晓琼 胡阳阳 姜忆楠

江昊宇 缴懿鑫 李 漩

李安琪 李冰莹 李 萌

李天翼 李志宇 宁鹏举

裴 瑶 唐铭兴 王 燕

杨 雪 杨至远 姚丽丽

于凯玥 赵姝婧

封面设计：于凯玥 刘芮宁

目录

编者的话 (I)

学术讲堂

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 唐永胜 (1)

时事观察

没有尊重，何谈新型大国关系 陈 永 (15)

学术论文

自治、族群-区域联邦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

——南奥塞梯分离的发生学 孙 超 (17)

国关人物

斯坦利·霍夫曼 (31)

他山之石

基于问题式学习与公民参与

..... 克里斯麦·金纳尼、莫拉·艾兹赫德亚瑟·卢比亚 (37)

海外国关人

赴美留学经验分享 刘奇峰 (45)

英采飞扬

叙利亚纷争 马逸群 (47)

永恒的经典 胡阳阳 (48)

目录

迎新特辑

- 经验分享..... (51)
- 学习攻略..... (54)
- 班级风采..... (55)
- 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入门推荐书目..... (59)

新书架 (三) (62)

院系活动

- 学术交流..... (65)
- 校外短讯..... (70)

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72)
-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73)
-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76)

读编往来..... (82)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84)

征稿启事..... (90)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2010年6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编辑组、新闻组和网宣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
(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

【编者按】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的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错综复杂,面临的安全压力也明显增加。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唐永胜教授从中美关系、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三个角度向我们阐释了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

主讲:唐永胜

时间:2014年7月18日

地点:南开大学范孙楼116

主讲人简介:唐永胜教授,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

(一) 中国安全形势出现新问题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我对于中国安全形势的一些认识,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在学期结束的时候来听我汇报。关于中国的安全环境,我想各位一定有这样的体会: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国家面临的安全压力和安全上的困难明显增加,比如: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有黄岩岛的争端,随后中日之间又有钓鱼岛矛盾的升级,到今天南海问题还时常有冲突,日本的右翼势力也是越来越猖獗。到今天中日关系还是我们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很难找到破解的办法。除了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和摩擦增加,中美关系也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加强军事上的部署和调整,强化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在军事上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来自美国的战略调整带来的负担,包括一些战略上的设计,包括“空海一体战”,美国提出在海上和空中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击的一个设想。

美国也有一个国防大学,也有战略研究所,我们的战略研究所和美国的战略研究所

每年都有一个对话交流,今年在我们这,明年就到美国那里去。我问美国战略研究所所长“海空一体战”针对的对象到底是哪个国家,他就明确地回答:当然是中国啊。这个矛头明确地指向了中国。美国人实际上还探讨了一些其他的作战样式,比如说提出了所谓的“海上战”,就是介于和平和全面战争中间的一个作战样式,设想在第一岛链之内对中国实施有限的军事打击,包括拦截商船、控制航线,用小型的导弹艇袭击中国海上的油气设施。这种作战的设想有很大的灵活性,一个是发挥美军的优势(灵活机动并不仅仅是中国军队的优势,实际上也是美军的优势);同时也没有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因为这是非常有限的军事打击,但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破坏。因为中国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大,尤其在经济上。如果在第一岛链之内对中国商船进行拦截和打击的话,那么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就会陷入瘫痪。这个设想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非常具体。所以我上面说的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的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个基本趋势去谋求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我们要扩大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更包括对未来统一半岛的影响力。这样的战略是“阳光下的战略”，没有不能对旁人说的。我非常反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首鼠两端的策略，既想

保持与它的联系用它牵制美国，又要防范美国遏制朝鲜。这是目前破解朝鲜半岛政策难局上我一直坚持的想法。

[整理：刘 志、赵姝婧、裴 瑶、王 燕]

[校对编辑：赵姝婧]

[责任编辑：王 燕]

“保护的责任”

“保护的责任”理念是对“人道主义干预”的重新框定。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于2001年最早提出“保护的责任”这一理念，认为国家有保护国民的职责，若无法履行职责，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有责任干预。按照其论述，主权的实质在于“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公民福利的积极责任”，如果人民遭受灾难，而国家没有能力或意愿采取有效措施，则“保护的责任”将取代“不干涉原则”，以作为对国家主权的“帮助”。这一论述减缓了国际介入与国家主权的冲突，将国际社会的关注点转移到遭受伤害的平民上，客观上消减了主权的绝对性。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认为，“保护的责任”包括三项具体责任：“预防的责任”、“做出反应的责任”和“重建的责任”。

尽管“保护的责任”在被提出后就被一些国际文件采用，但多数国家都对此持谨慎态度，并无足够共识，例如，“保护的责任”的试用范围暂时被限定在针对“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等行为。

摘自陈拯：《框定竞争与“保护的责任”的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第111-127页。

[整理：李天翼、姜忆楠]

没有尊重，何谈新型大国关系

陈永*

8月19日，中国一架歼11战机在南海近距离接触美国P8反潜巡逻机，两机距离仅为9米，歼11做出一个翻滚动作。随后，美国军方指责中国战机“挑衅、很不专业”，国防部和国务院多个部门煞有介事地提出抗议。这一幕与十三年前的那场悲剧惊人相似。彼时，中国执行监视任务的歼8战机与美国EP3电子侦察机相撞，飞行员王伟牺牲，中美关系也跌入冰点。如果不是五个月后911事件爆发，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到反恐领域，两国关系想必会险象环生。

经过近十年苦战，美国好不容易从伊拉克战争的泥潭拔出脚却发现亚太局势已发生深刻变化。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显然不是十年前任由围堵的“受气包”了。于是，美国一方面高调宣称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另一方面反复强调“中国不是苏联”，两国应建立没有先例可循的非对抗大国关系。美国的行为可谓软硬兼施。这种“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最佳平衡”的大国关系思路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切回应。两国元首共同倡议中美应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断丰富其内涵。这一中美关系新畅想的精髓在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然而，从目前的情景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基础薄弱，前途不容乐观。

“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和平相处的最低要求，也是在现今形势下的迫切要求。中美两国只有以“相互尊重”的态度，认真审视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美国务院发言人再三强调P8是在透明地“寻常巡逻”，而中国军机拦截则是不透明且危险的，当中国记者诘问这种抵近侦察对中国算不算是挑衅时，这位发言人却不愿正面回应。看来，在美国看来，这种对中国进行的海空不间断侦察已经常规到理所当然的地步了。整天围绕中国转，看个一清二楚才心安，却全然不去想给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此举显然不是尊重的态度。

有观点认为，等到中国的军力强大了，也派飞机和军舰在美国周边进行海空侦察，看看美国人有啥感受。这种说法虽然解一时之气，但是并不足取。众所周知，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明侦暗察，相互斗法，不仅没有增加彼此的安全感反而使全世界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如果对对方的军备建设不放心，两国完全可以利用正当和正常的军控和裁军机制，增加军事力量的透明度，而非以牙还牙。不过，美国最新表态，无意于减少对中国的例行侦察。这种拒绝反思的态度使得这个问题近似无解。未来，中美两国飞机和军舰更多的近距离接触恐怕难以避免。

除了不尊重中国的安全利益外，奥巴马总统此前揶揄“中国搭了三十年便车”，谁也不

* 陈永，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能指望中国做啥事。这个断言不断抹杀了中国在促进世界发展和和平稳定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而且在中国人看来是轻佻的。不少中国人在不满美国贬损中国的国格之余，也提醒美国人甭打算让中国人充当替美国收拾烂摊子的“冤大头”。这种由美国采取不尊重态度引起的冲突和对抗心理使得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利益上“合作共赢”的前景黯淡。此时，ISIS武装在中东地区摧枯拉朽般扩张，既损害了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成果，也危及中国的经济利益。美国虽然不能指望中国出兵，但是放下倨傲的态度，少一些指责，便能期待中国的积极支持。

当今世界，中美两国的实力领先于其他大国的趋势明显。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困难也在使两国采取相互尊重的态度更加迫切。中美彼此体谅，多一些合作，有助于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共管地区热点，实现共同发展；多一些对抗，许多好事不但做不成，也可能触发意外，甚至将两国关系拖入险地。为了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多一些希望计，美国还是对中国多一些尊重，少一些逼迫。

[责任编辑：李冰莹]

..... 制度嵌入

制度嵌入是指“在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组织之间，一个组织介入到另一个组织中，实现了一定的耦合，它不仅属于原有组织，而且成为另一个组织的一部分，接受来自两个组织的规则和规范的双重约束”。制度嵌入的最明显表现是组织部门之间的嵌入。美国军事制度变迁的历史表明，制度嵌入的一种可能路径是从边缘嵌入到中心嵌入的过程，同时伴随有“再嵌入”（包括军事制度的对接和规范的内化）与权力转移的制度化。

摘自左希迎：《嵌入与冲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66-92页。

[整理：李天翼、姜忆楠]

自治、族群-区域联邦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

——南奥塞梯分离的发生学

孙超*

内容摘要：自 2008 年俄格战争爆发以来，南奥塞梯问题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作为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南奥塞梯不仅牵涉到国内的民族问题，更牵涉到国际伦理规范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等诸多问题。本文将以南奥塞梯的分离作为分析的核心，仔细探讨南奥塞梯分离的由来。本文主要涉及三大块内容：第一部分思考南奥塞梯“自治”内涵，通过对政治自治和行政自治的区分，探讨南奥塞梯分离之源；第二大块内容，则运用族群-区域联邦主义视角，探讨南奥塞梯分离种子的孕育；最后一部分则使用族群-民族主义工具思考南奥塞梯分离出现，正是冷战后。分离将作为南奥塞梯政治现状而长期存在，南奥塞梯存在独立的潜在风险。

关键词：南奥塞梯；分离；自治；族群-区域联邦主义；族群-民族主义

南奥塞梯的分离是如何出现的？如果仅仅从地缘-历史因素解释就会陷入某种特殊论的藩篱。但是为什么其周围的高加索诸多民族却没有形成分离运动？南奥塞梯的分离首先是从苏联时代自治开始的。自治给南奥塞梯带来了什么？苏联的民族政策给南奥塞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苏联解体后这种影响又如何发生影响到南奥塞梯的分离？本文从三个视角：自治（autonomy）、族群-区域联邦主义（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和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出发探讨苏联时代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制度如何改变南奥塞梯的自治理念，探讨其在苏联解体后为何急于寻求独立，并思考后冷战时代南奥塞梯分离的发生机制。本文共分四节：第一节解释作为一种制度概念的苏联自治内涵，结合民族原则等探讨其机理；第二节简要分析苏联时代的政治制度，诠释族群-区域联邦主义的概念，阐释其对苏联统一内在的破坏性；第三节概述苏联解体和解体后战争给南奥塞梯带来的巨大政治冲击，而这种冲击鼓励南奥塞梯的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促进分离的发展；最后一节进行总结。

一、自治、苏联社会主义与民族

布尔什维克政权在革命取得胜利的立国之时就面临三个问题：1. 如何继承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多民族遗产；2. 如何恢复和重建一个历经战乱、暴力和血腥的国家，重新组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强大国家；3. 如何为新生的苏联政权赢得国内外的合法性。列宁在 1917 年《国家与革命》中开篇就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剥削最压迫人民的工

* 孙超，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不可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①

科科伊季在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对峙中获得了巨大的个人魅力。而得到俄国的支持更加增强了科科伊季维护南奥塞梯“安全”的决心。2003年的1月,格鲁吉亚报纸登载俄国帮助南奥塞梯建立起军队,并提供援助。^②冲突逐步升级的格-南关系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③

2008年8月7日午夜,萨克什维利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向南奥塞梯发动进攻,“八月战争”爆发。格军遭到南奥塞梯的强烈抵抗,同时俄军进驻南奥塞梯击退了格鲁吉亚的进攻,并迅速推进,一度接近第比利斯。8月12日格俄两国在欧盟的调停下实现停火。8月2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正式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国作为主权国家独立。“八月战争”震撼了欧亚大陆,美俄欧相继作出反应。南奥塞梯的族群-民族主义首次得到大国的承认。南奥塞梯的分离问题从高加索内部问题上升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在高加索的博弈的战略问题,并折射出宏观国际格局变化的重大端倪,预示着国际力量格局转换的肇始。^④

“八月战争”给南奥塞梯的分离带来重大鼓舞,大国的介入使得萨卡什维利难以将南奥塞梯作为国内问题处理,南奥塞梯的国际性因素提升将大大打击格鲁吉亚统一的努力。而族群-民族主义在挣扎多年之后因为此次战争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因素,亲格派瞬时被亲俄派的科科伊季所打败,分离得到了俄国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则将促进南奥塞梯为获得国际承认而进一步努力。

四、结论

作为正在争取获得国际承认的南奥塞梯,战争给其带来的巨大的动力和信息,战争将南奥塞梯的分离问题国际化并得到广泛的国际社会关注。南奥塞梯的分离为“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的分离带来巨大的动力和鼓舞。当今乌克兰危机也正在悄然酝酿分离之险,正在悄然预演南奥塞梯分离之情景。后苏联空间的政治发展如今已经面临巨大的分裂化趋势,欧亚后苏联空间的整合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如今得到俄罗斯承认的南奥塞梯基于历史与地缘因素等于获得了历史上的宗主国的认可,而正是这种认可使得南奥塞梯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而正是这种合法性使得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在对话和冲突时角色与地位发生悄然变化。分离从一种机制上的演变转变成一种政治上的身份认同,这种分离动力的转变让南奥塞梯向主权国家的方向迈出重要一步,并影响到格鲁吉亚的未来政治整合。

[责任编辑:江昊宇]

^① Oleg Teziev, “Kokoity’s Opposition is Peering Out from Vladikavkaz”, *Georgia Times*, May 14, 2009, <http://www.georgiatimes.info/en/articles/12531/html>

^② Pavel Bave, “The South Caucasus: a challenge for the EU”, *Chaillot Papers*, no.65, December 2003, p.79

^③ Svante E.Cornell, “Georgia after the rose revolution: Geopolitical predica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February 2007, forward,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m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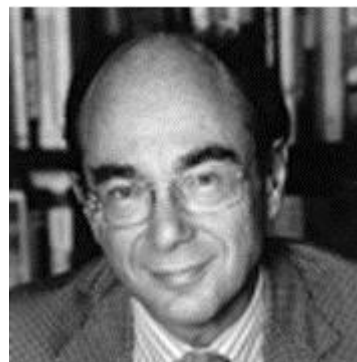
^④ 冯绍雷:《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危机政治经济学’——俄罗斯于大国关系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第68-79页。

斯坦利·霍夫曼

【编者按】介绍当代的国际关系人物，不能不提到斯坦利·霍夫曼，这是一位人生经历丰富、研究范围广泛、研究视角独特的国际关系学者，其研究范围涉及欧洲一体化、美欧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全球化等多个领域。作为政府间主义的创立者与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欧洲一体化与国际安全研究。本文选取其在欧洲一体化、全球化和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成果，为大家做简要介绍。

学者简介

斯坦利·霍夫曼 (Stanley Hoffmann)，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保罗和凯瑟琳·伯腾威泽大学教授” (the Paul and Catherine Buitenhuis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Harvard)、名誉教授。1928 年出生于维也纳，1929 年因遭到纳粹追捕而随家人逃往法国，在巴黎和尼斯 (法国南部港口城市) 生活和学习。1947 年加入法国国籍，后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并取得学士学位。1952 年在哈佛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又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6 年起于哈佛大学任教至今 (除 1966-1967 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1969 年创立哈佛大学西欧研究中心 (Harvard's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至 1995 年。



霍夫曼教授拥有法国和美国的双重国籍，并曾经是英国现实主义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 (Arnold Wolfers) 和法国现实主义大师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的学生，特殊的身份和人生经历为他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与独特的视角。在欧洲一体化研究领域，他强烈批判了厄恩斯特·哈斯 (Ernst Haas) 等人的新功能主义理论，提出了政府间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一方面承认国家间合作的重要作用，但仍然强调国家才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这一脱胎于现实主义，并带有些许自由主义色彩的理论，体现在他的所有研究之中，并深刻影响了他对全球化和国际安全的有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反对一味进行定量研究与数字分析的做法，认为在社会学、政治哲学和历史视角下开展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霍夫曼教授的主要作品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ntice-Hall, 1960)，《衰落还是复苏？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法国》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Viking Press, 1974)，《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冷战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 (Primacy or World Ord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McGraw-Hill, 1978)，《两面神和智慧神：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论文选》 (Janus and Minerva: 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7)，《冷战之后：国际制度与欧洲的国家战略》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Europe, 1989-1991, co-edited with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等。

一、欧洲一体化与政府间主义

(一) 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演进

在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中, 历来有两种主流的解释范式, 分别是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和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 两种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批判、相互影响, 共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前进。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一些学者在对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进行修正的基础上, 提出了新功能主义理论, 其代表人物包括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菲利浦·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利昂·林德伯格(Leon Lindberg)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 新功能主义占据了欧洲一体化研究的主导地位。

“外溢”(spillover)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 即把一体化视为一个不断变化、自我强化的过程, 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会产生出超出预期的效果, 一个领域合作的成功会自动地扩散到其他领域, 推动其他领域合作的发展。“外溢”可以分为功能性外溢(functional spillover)和政治性外溢(political spillover)两种。按照功能性外溢的观点, 一体化首先产生于经济领域, 由于“外溢”效应的存在, 经济领域的合作外溢到政治领域, 必将推动政治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政治性外溢则意味着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公众对政治行为体的忠诚会逐渐从成员国转向共同体, 民族精英也会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超国家层次的活动和决策, 支持一体化进程和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 长此以往, 超国家机构和非国家行为体将在一体化进程中承担主要的作用, 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则会随之减弱; 而且一体化的重要性也会要求各国精英在超国家层次上实行更多的政治控制。按照哈斯的说法, “欧洲一体化是一个从功能领域发展起来, 可以通过外溢不断自我持续的、并最终能够在政治上实现更紧密联盟的进程”^①。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 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了重大的阻碍。1965-1966年, 法国代表拒绝参加理事会会议, 导致了“空椅子危机”,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超国家性趋势受到抑制, 政府间合作的倾向加强。^②新功能主义的解释力受到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斯坦利·霍夫曼为首的一些学者在批判新功能主义的基础上, 提出了政府间主义理论。

(二) 对新功能主义的批判

霍夫曼对新功能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首先, 新功能主义过于强调了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实际上民族国家依然在一体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十分有限。在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领域, 成员国政府不可能愿意以其他领域的所得来补偿在这些领域的所失, 它们将会试图降低不确定性并设法对关系到核心利益的决策过程严加控制。

其次, 新功能主义忽略了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区别。功能性联系并不像新功能主义者设想的那么具有决定性, 外溢效应不会自动出现。在低级政治(如经济政策、福利政策等)

^①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② 张曙光、张胜军: 《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自由政府间主义》, 《国际论坛》2011年第3期, 第60-64页。

领域，外溢效应的出现比较可能。但在高级政治（如外交政策、安全与防务等）的领域里，成员国政府将要求获得明确一致的目标，外溢效应便很难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新功能主义只对低级政治领域具有解释力，国家间关系不可能超越政府间合作而发展到高级政治上的超国家一体化。

最后，公众对政治行为体的支持和忠诚不会真正从成员国转向共同体，民族国家精英关注的焦点也不会从国内政治转向共同体层次的政治。成员国政府对共同体的政策取决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如新功能主义者所说的本着解决问题的精神进行合作。即使是关系到成员国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也还需由成员国政府做出决定。^①

（三）政府间主义的内容与影响

政府间主义遵循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传统，明确坚持以主权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政府间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从本质上讲是自助的，在国际体系中只有国家才是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体，民族国家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一体化反映的是成员国政府的意愿，服务于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并受各成员国国家机构的控制。不符合成员国国家利益的一体化事务将不会得到成员国的支持，即便它们对于共同体来说可能意义重大。

根据政府间主义的观点，共同体层次的决策过程是典型的政治活动，成员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共同体框架下的活动实际上是成员国国内政治活动的延伸，一体化的每一次实际的进展都源于成员国之间的讨价还价的交易。而且共同体层次的决策是一种零和博弈，“损失并没有以在其他问题上的收益来补偿——谁都不想上当受骗”^②。在政府间主义看来，一体化是国家的理性行为和政治决策的结果，超国家机构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霍夫曼的政府间主义理论实际上是深深根植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之中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些学者将他的理论赋予了“现实主义政府间主义”（*realist intergovernmentalism*）的称呼。这一理论，作为一种研究国际关系的独特的思维视角，不仅深深影响了霍夫曼其他方面的理论研究，更是被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等人借鉴并发展为自由政府间主义（*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从而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全球化的冲突

（一）全球化的客观现实

自全球化意识诞生以来，预测全球化发展前景的理论模式层出不穷，其中“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现实主义”是最受关注的三个模式。“历史终结论”，又称“共产主义失败论”，是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

^① 张茂明：《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政府间主义》，《欧洲》2001年第6期，第45-54页。

^②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Vol. 95, 1966, pp. 862-915.

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最终归宿的发展史,未来将不会再有更好的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人类历史将至此走向“终结”,在此基础上,福山预测了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和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胜利。继福山之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上的冲突将以文明的冲突为主导,并由此提出“断层线战争”的理论。现实主义学者则仍然坚持主张,即便今天的全球化正在飞速发展,但经济和军事依然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他们对全球化的未来持悲观的态度。对于以上几种理论,斯坦利·霍夫曼在对其提出质疑的同时,更明确点明了全球化的客观事实。

霍夫曼提出的第一个事实是强权对立。全球化的发展需要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然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作为巨大的威胁因素,阻碍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意味着国际行为体之间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等方面交流合作的日益密切,而在全球化发展并不完善的今天,各国为了利益最大化将不可避免地进行实力的较量。从军事角度来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限制世界大战爆发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军事较量,并促进了安全困境的产生。

第二个事实是国内政治对全球化的阻碍。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组织的支持,同样也离不开国家内部的帮助。国家内部决策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经济因素、排外情绪、历史遗留等方面的影响,这将影响其对国际组织或某个国家号召的全球性活动参与的积极性。其次,一些国家内部也在进行着不断的政治斗争,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三个事实是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是国际关系与全球社会的一种血腥联系,霍夫曼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为恐怖主义提供了便利,随着个人和团体纷纷加入全球活动,国际行为体的不安全性和易攻击性进而增加。自“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带来的伤害和打击真正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采取了反恐行动,由此造成的人员往来和资金流动的限制影响了全球化的发展。

(二) 全球化的矛盾

霍夫曼认为,目前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大多是基于美国的影响。全球化诞生于二战以后,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产物,其稳定性和发展性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我们大可以假设,当美国的实力衰弱且全球化水平还未达到足够完善阶段的时候,全球化的建设就可能土崩瓦解。这便是全球化的第一对矛盾。因为全球化依赖于美国的实力,美国因此而推行它的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这样的全球化便会遭到实力落后国家的抵制,南北两极分化将因此而更加严重。霍夫曼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有“锡拉岩礁”(Scylla)后有“卡律布迪斯漩涡”(Charybdis)的危险境地。其中“锡拉岩礁”是指新出现的恐怖袭击、人道主义灾难和可能升级的区域性战争;“卡律布迪斯漩涡”是指美国通过单边主义干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事务。因此,美国是全球化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全球化的另一对矛盾。霍夫曼认为,全球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世界各国人们固有的国民性,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包括欧盟的成员形成了后国家的公民意

识。实力越强大的国家越能给本国国民以优越的身份认同感，世界公民意识就越难形成。实力落后的国家本身在全球化中就处于弱势地位，全球化水平的落后使它们的世界公民意识同样难以形成。

（三）全球化的未来

霍夫曼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全球社会，国家与全球社会经常重叠，并受累于脆弱的公共机构和欠发达的市民社会，全球化的未来更是扑朔迷离。因此，霍夫曼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两个使命：一是必须通过清点所有的“问题”和理清国际事务的来龙去脉，来理解世界的现状；二是不应该因为担心把经验与规范混杂起来就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事实上，许多哲学家已经把正义社会的概念引申到了国际关系领域，正如已故的哲学家朱迪斯·夏克勒（Judith Shklar）所说，“把暴力和压迫的受害者的命运和悲惨境遇作为一个出发点和线索，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寻求物质和精神的解放”^①。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对国际关系的正确认识，缓解全球化的冲突。

三、霍夫曼的国际安全思想

（一）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

霍夫曼认为，当前国际安全已经突破了国与国的范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于各种矛盾交织激化而催生出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安全新的不稳定因素。如今，挑战国际安全的行为主体已不再停留在国家的范畴，一个组织，甚至一小撮装备简陋的个人都有可能引起世界的动荡。此外，影响国际安全的原因也正在从国际化向国内化发展。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内部的分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即全球化之间的冲突，特别是那些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诞生的国家，它们的内部战争会将其它国家卷入复杂的国际冲突之中，进而成为破坏国际安全秩序的重要因素。

影响国际安全的具体因素也在不断地多元化。全球化对国际安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其不稳定性、不平衡性、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不平等性和有限性都可能滋生威胁国际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国际安全体系达到平衡的关键之一是各国军事实力的相互制衡，但核武器的出现及扩散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核武器的存在给拥有核武器的大国间的关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谨慎，而当更多的国家开始寻求其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缩小与核俱乐部国家之间的差距时，减缓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尤其是扩散到危险的“无赖”国家）的努力，可能反过来成为产生暴力活动的新原因。^②

（二）确保国际安全的途径

霍夫曼希望通过建立一种世界秩序来确保持续的国际安全。这种秩序的定义有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① 斯坦利·霍夫曼：《全球化的冲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64-68页。

^② 刁忠元、庞喜海：《试析霍夫曼的国际安全战略思维》，《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9期，第230页。

1.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关系处于和睦状态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2.世界秩序是国家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有规章的程序,它能提供制止暴力、防止动乱的有效手段;

3.世界秩序是指合理解决争端和冲突、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有序状态。

而实现这种秩序的主要方式是构建国际关系伦理,其基本内容有以下三点:

1.在国家间关系上,对武力实行道义的限制和制止,提倡平等交往、国际礼让、信守诺言、尊重主权、反对武力,强调“正当的目的,适当的手段和必要的自制”;

2.在对外政策的目标上,突出保护人权的原则;

3.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平等公正的世界秩序,以伦理和道义的力量结束世界上的“行为无节制”、“局势不稳定”的状态。^①

在操作层面上,国际合作仍然是确保国际安全的重要途径。霍夫曼认为,意识形态的差异依然是目前影响国际和平的重要原因,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要求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而否定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国际冲突并没有超越国家的层面,国家仍旧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也是通过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安全的主体。全球化的发展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出现充分说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日益紧密,国际机构的作用加强了,而不是像许多人预料的那样变得次要和脆弱。同时,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在世界市场中确保公平,在诸如贸易、通讯、人权、移民和难民领域创建国际权威的管理机构,不仅在多种多样的低级政治领域发挥必不可少的国际辅助、协调甚至组织作用,甚至在依旧最为紧要的国际安全方面,也扮演着日益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如同纽带一样加强了国家间的联系,从而促进了国际安全的发展。

(三) 理解与评价

霍夫曼曾说过“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这经常被一些学者误解为是他对美国霸权的痴迷。但实际上,霍夫曼对那些片面强调美国制度的优越,并不顾其他国家具体情况,通过强权政治的手段强力推行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的做法是极为反对的,他更曾经明确指出,自2001年以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表明单边主义的绝对惨败”。总的来说,霍夫曼的国际安全思想依然充分体现着他“现实主义政府间主义”的思想特点。一方面,他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世界秩序的重要作用;但在根本上,他依然坚定地认为国家是国际合作的主体。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之下,他对美国霸权的强调,更像是一种对国际政治现实情况的描述,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整理:江昊宇、李萌、宁鹏举]

[责任编辑:宁鹏举]

^① 李宏亮、阮春良:《解析斯坦利·霍夫曼的国际安全思想》,《社会市场》2006年第8期,第187-188页。

基于问题式学习与公民参与

——转移公共政策教育的学习焦点

克里斯麦·金纳尼 莫拉·艾兹赫德*

内容摘要: 这篇文章叙述了一项通过参与现实世界情形以帮助政治专业的学生加深他们对于公共政策理解的创新性教学方式的发展。它描述了一个研究生公共政策模块中建构主义学习环境(CLE)的发展,且这一模块由基于问题式学习(PBL)方法与公民参与整合而成。这篇文章通过检验这种方法作为教学手段的可能性并综合学生、教职工的反馈以及合作机构、广大公众所描绘的收益以进行总结。

教授政治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向学生教授公共政策,要在一定程度上有吸引力、有趣、提供有效信息,并且能够建立起学生的能力,正呈现出持续的挑战。这篇文章描述了一个致力于整合基于问题式学习(PBL)方法和以主动的、大学支持的、公民参与的方法,向来自包括中国、爱尔兰、拉脱维亚、尼日利亚和美国的13位研究生教授公共政策来形成更丰富、更深刻的学习体验的初始实验。这篇文章首先通过描述我们采取这种混合方法教授政治学的动机和解释对这种方法起提示作用的概念模型来介绍此练习的一些概念基础。然后,这篇文章继续展开,其间此方法将在描述学习情境、政策情境和特殊问题的背景中经受检验。在倒数第二节,对于学生、教学、外部政策行为体以及更广大公众而言,这个练习的关键成果将得到介绍。最后,文章得出了关于这个练习价值和潜力的一些结论,并描述它是如何引发创建一个更为系统和更具挑战性的PBL实验室计划的。

建立概念原理

在这一节,我们考虑我们想要政治学和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去学习什么,和我们可以怎样使用PBL方法来使他们更为积极地参与。

政治学和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别,二者之间可能的关系是什么,以及我们的教育成果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大多数政治科学家直观了解却又极少表达的,无论是对于他们自己或者对于其学生。政治学研究作为一种用以理解大量政策过程、体系、行为以及巩固其价值、态度的手段来呈现。尽管传统认为政治学是关于权力的学问或谁得到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和为什么,在许多方面,“政治学是政治科学的接合学科,脱胎于历史和哲学,但利用经济学和社会学以及在较少程度上的,法律、心理学和地理学研究的洞见”。

* 本文原载于美国《政治学与政治》杂志2013年7月号(*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46, issue 03, 2013, pp. 630-636) 克里斯·麦金纳尼(Chris McInerney)是利默里克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专业的讲师,他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管理与社会接受/排斥的概念,实践与过程之间的关系,公民社会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公共管理在推进社会公平中的角色。他的邮箱 chris.g.mcinerney@ul.ie。莫拉·艾兹赫德(Maura Adshead)是德利默里克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专业的高级讲师,曾在敦提大学,利物浦大学,埃塞克斯大学,戈尔韦大学,都柏林大学任教,她的邮箱是 maura.adshead@ul.ie。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除了对于特定政治过程的细节性理解——政治专业的学生更期待去学习什么呢？当要追问一个答案时，对大多数政治学提纲的大略一瞥表明“批判性思维”（作为解释政治现象的一种手段）是一个关键学习目标。政治科学是对这一学科内具有一系列理论假设和方法论路径且最常使用的基本属性的丰富。到目前为止，尽管最近大部分关于公民参与和服务学习的文献已经开始间接地点出这一议题，这个问题只受到了有限的关注。考虑于此，Gorham提出了关于培养政治思维的政治学习概念。就学生学习而言，政治思维可能具有广泛的维度，但这些可能包含发展对政治学的兴趣；学习何为公共和私人利益；学习怎样在政治世界中参与和反思；学习怎样政治地聆听；最后，学习怎样作为理智的表演者和慎思的观众判断政治世界。在课堂中激发这种类型的政治思维远非易事。

为提升学生作为批判的政治思考者的能力，Gorham认为政治思维最有可能出现“当课堂经历本身作为公共空间被整合为学习服务”。这种教授政治学的方法反映了Stoker的告诫，即我们应该停止讨论政治学并反过来创造更多机会去实践它。这自然而然导向关于学生应该如何在地参与现实生活中的政策的问题。并且，在探索这种练习将怎样为政治专业的学生服务的教育基础时，我们转向查阅有关“基于问题式学习”(PBL)的文献。因为相对来说几乎不存在有文献可考的PBL在教授政治学中的使用，然而，当我们转向其他来源，特别是其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研究领域时，有篇文献表明在正式考试中拥有PBL经历的学生相比接受传统教育的学生可能不会呈现出同样的知识量或表面的知识水平，然而，这些学生在其知识深度上表现出明显的进步，而且至关重要是他们应用知识的能力，而这促进了相较于叙述性的知识而言，更为功能性的知识的水平的提高。由此前提引申即接受过这种教育的学生拥有功能性知识，也即拥有实际的而非设想的——能力，在进入劳务市场时是储备更优的。

什么是基于问题式学习？

在探讨PBL时，尽管多个核心原则已标明其特殊的路径，显然并不存在单一的PBL模型。参照Barrows的基础研究，这些核心原则包括专业设置中所使用的知识结构化和知识管理过程——包括政治领域；培养质疑和探究能力——任何公共政策情境中的核心元素；鼓励自我学习与小组学习的能力；以及与被动受教相对的主动学习。为实施这些核心原则，我们采用了一个特定的PBL模型，即建构主义学习环境(CLE)。这种PBL方法的实质包括“一个与不同解释性/智力性支持体系相伴随的问题、疑问或计划作为环境的中心”。在教育上，这种方法提出当学生集中参与到解决“问题是什么”的过程中时，他们将会对议题有一个更深的理解且更为主动地去寻找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问题选择驱动学习而非在课堂上提供所要教授的概念或理论案例。有效的问题“不应该过度受限”而且反过来应该是“定义不清晰的或结构不明的，因而问题的各方面对于学习者来说是新颖的和可定义的”。一个表述不明的问题的特征包括未陈述的目标和限制；多解决方案或根本没有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方案评价的多重标准；关于哪个概念、规则和原则对于解决方案是否必要或它们怎样组织的

不确定性；缺乏描述或预测大多数案例结果的任何一般规则或原则；对学习者的判断和坚持判断的必要性，以及表达个人意见或信念的意见。简而言之，我们选定的 PBL 方法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学习情境、公共政策情境和问题描述/解决方案情境。这其中的每一条都将在下一节叙述。

组织政治学的 PBL

这部分我们讲述的是，我们如何在 PBL 的练习范围内为这一模型建设学习情境，政策情境，以及呈现问题。

学习情境

这项练习的学习情境由我们所熟悉的大学教室和课外学习平台结合而成，而我们对附近乡镇的一个公民参与法案的参与则使之成为可能。选举产生的乡镇委员会也邀请我们系来支持该议案。

PBL 练习是公共政策研究生模块和涉及多国学生项目管理的核心因素，因此增加了设计关于模块输出较小的种族因素影响的方法的额外难度。这个模块主要致力于提高学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不同行为体的角色的理解以及在政策规划过程中判断“孰去孰留”的潜能。这个模块也力图使学生掌握关于政策分析和制定的功能性技巧。虽然正式课程只有四个月时间，但在完成正式课程要求后，好几个学生对练习保持了更长时间的积极性。尽管学生被要求作为小组的一部分参与评分分级，但是他们个人也需提交一篇独立完成的论文，而这旨在刺激学生对自己所研究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同时也避免了“搭便车”的可能。作为 PBL 练习的规范，我们会提供最初的一些阅读材料——在这个案例当中，主要是关于民主参与和公民互动，而学生们被鼓励自主选择参考文献。

政策情境

PBL 的政策情境是由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框架——国家空间战略（NSS）提供的，同时该战略也将后续在地方层面实施。NSS 是爱尔兰政府 2002 年为“实现区域间社会、经济、物质发展和人口增长更好的平衡”而制定的政策。为进行一项重要的城镇居民用户的公民参与训练——社区视野训练（a community-visioning exercise），附近乡镇做出重要决定——以支持城镇及其远郊的新社会经济计划的发展。这项创新性举措也为我们系的学生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给学生设置了一些问题，要求他们解决至少一部分由公众参与提出的公共政策制定的难题。在这个情境中，学生们接触到大量关于选举代表、官员、城市社会组织之间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紧张的关系。同时，我们在课堂上研究 NSS 的细节、相关政策议题以及概念内容。

问题情境——介绍和解读问题

在 PBL 方法中，问题呈现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不完整定义的“契机”来让学生能够自己定义或者建设自己关于问题的表达。学习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于问题的解释过程。在这个

案例当中，问题以一张单独做过处理的大桥建设计划的图片来呈现，照片中的大桥分别从两端独立建设而最终未能在大桥中部合龙。而图片却配了一个“问题”标题：“公共政策中的公众参与——最终会合！”图片在模块当中可以被解释为是对所探讨的核心主题的隐喻。例如：关于“我们如何理解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图片可被理解为：参与者在建设过程中是否具有相同的愿景或观点。关于不同行为体在政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图片可引申出谁对问题产生负责与谁应该负责解决问题的相关议题。最后，关于问题的解决过程是开放性的还是封闭性的，图片引出讨论“是否一方应该‘继续进行’而忽略另一方”；或者是否双方都应该改变方向，并且如果是这样，他们应何去何从？通过在抽象的隐喻的画面之中呈现这些问题，含糊的定义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决定看到什么问题，以及与此问题相关的理论与实际内容。

通过划分学生的特定小组身份，问题表示将被进一步推敲：政府官员、社区活动家以及选举出来的公共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参与式策划过程。参照有关公民参与、协商民主、制度主义的公共管理路径以及政策风格的文献，学生从群体身份出发，使用交替的概念框架来探索、解读与解决具体的问题。在 PBL 的早期阶段，学生必然会因为问题抽象的本质而失望，但是当他们意识到失望是学习过程的必然阶段时，学生的焦虑会减轻，并在课堂上更加积极地“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问题的探索空间

PBL 方法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让学生能够探索与解读问题的空间。换言之，在学生开始解释问题是什么后，除了其被分配的身份之外（作为公共官员，居民，公共代表等等），我们还提供了另一种背景来让他们进行探索。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帮助学生进行了三个层面的政治互动：

首先，有组织的、邀请性的公众互动通过一般的市政厅式的会议的形式来实现，在这里市民讨论他们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观点和期望。学生将参与设计并实施这些议程，并且格外注意公众会议的后勤事项，如适当的地点、时间安排以及友好的氛围对于公众参与的推动作用。

第二，目标性的互动将被更精确化地设计以获取不同政策利益相关者的看法。这些互动包括与选举产生的决策者会面来使学生了解决策过程的政治元素与代表的观点；与官员接触来了解行政思维；或与常被决策过程忽视的青年人团体进行交流。

第三，公共空间互动被设计用来确保学生意识到许多市民并不参与公共会议。采用参与式评估的改进形式，学生与当地人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交流，例如购物中心和咖啡厅。无疑，这些互动会有更多的时间限制，但是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机会去征求那些不会参与正式政治场合的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在课堂上，随后讨论组织性较弱的公共空间与组织性较强、邀请民众参与的公共空间的比较结果。基于社交媒体的第四种互动方式也经过尝试但是收效甚微。或许社交媒体工具的使用需要在课程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或者也可以让特定的学生以社交媒体的视角去处理

问题。

成效

这种训练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成效,不仅包括学生学习和教学方面,还包括促进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知道仅有有限的资料可作为问题导向型学习方法的坚实依据,而通过观察这种混合了 PBL 与公众参与的项目,我们发现学生在其中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收获。通过对学生样本团体进行结构化的外部评估以及研究参与该项目的学生的日记,我们总结出了该模式带来的学习效果。以下是政治学专业学生对于这种教学方法以及学习效果的反馈。

PBL 方法

PBL 学习经历对于该项目中所有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此外,虽然一些学生具有一些参与社区活动的经历,但大部分学生没有经历过任何形式的公众政治参与。因此,与既成的、有时稍显陈旧的学习模式相比,该项目是一种新的工作和学习方法。比如一位学生这样描述该项目:“一开始我有点迷茫,因为这完全是一种新的学习形式。我在自学时遇到了一些困难。”的确,PBL 需要学生具备较好的自我引导学习和分析能力,不仅限于学会解决比较宽泛的问题。项目推动者通过研究学生样本得出结论:“学生们认为基于问题式学习的抽象本质往往难以把握。尤其是学习过程中运用的一些辅助性的比喻让他们难以理解。但是同时,PBL 学习过程也使得一些概念得以具体化,并且允许学生更多参与到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因此,虽然学生起初感觉问题抽象且难以把握,但最终他们成功理解并且解决了问题。该方法使学生认识到,对于公共政策的理解不能过于着急,否则可能会对政策产生严重错误的理解。

PBL 在注重参与过程以及实际应用的同时,也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性。样本团体的数据显示,比起理论性学习,学生们更偏好实际应用的学习,表明学生们希望“多做、少分析”。虽然学生们乐意读完要求阅读的文献,但是学生们愿意花费更多课堂时间来为公众参与做准备。一个学生说:“我在参与上比阅读理论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并且以后可能还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参与上。我希望在其他的学习中也能有这种偏应用的学习方法。”

培养对政治的兴趣

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培养项目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对政治的兴趣,此外还要使学生认识到,政治远比报纸头条复杂得多。学生的反馈表明,这种训练成功超越了课本,使学生们进入了真实的公共政策的世界。一位学生认为该过程“使得公共政策对我来说具有了 3D 效果”,并且他“对于决策团体及其决策过程更加了解”。另一位学生认为该过程“使我对有关公共政策的实际问题更加了解”。这些评论也在样本团体中的其他学生身上有所体现。其中一位学生认为,“这种学习方法很有趣,使你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许多实际经验,而不是只阅读特定的教科书,欣然接受作者提出的理论和结论。在这种学习中,你实际上在真实的生活中看到了理论如何被应用。”对于另一位学生来说,这种直接观察公共政策领域运作的机

会非常有用,也激发了她对于就职于公共领域的兴趣。此外,这也使她理解了制度主义的方法可以帮助对公共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政府机构的运作不仅仅是按照流程进行决策。这些机构由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构成,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想法都要体现在实际运作中,因此每个你想要执行的项目都可能受到挑战。”除了工作范畴,一些学生也说他们因为PBL项目而更加想要作为市民参与活动。这样,使学生有效理解公众对政策的影响以及有效参与政策决策过程的目标得以实现。“总体上来讲,我对于一个政治团体如何试图达成一个目标、完成一项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想把这种体验真实生活的学习方法推荐给所有的学生。”

学习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个人利益

政治学以及公共政策学习的另一目标是鼓励学生区分公共及个人利益。在这一方面,学生通过他们自己以及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来学会认识这种区别。一位学生认为这种学习过程“不那么自私自利”,因为大家必须要分享学习收获。此外,在观察学生对于其他关键因素的态度时,一位学生对政府官员角色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认为“作为一个官员,他的所作所为更可能是有利于官员自身而不是有利于公众。我很不认同政府官员相对于公众的这种优越感。”同样,研究表明学生中存在“许多对于政治的讽刺”,认为“政治家很清楚他们所拥有的地位。”这说明学生观察到一些政客谋取私利的可能,以及对地位的认识影响了他们作为政策参与者的参政能力。

学习如何参与政治生活如何思考政治世界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如何参与政治生活如何思考政治世界非常重要。一些即时的学习报告说明,学生认识到对于公众参与的管理与简化可以是高效的,经济的。一位学生认为“世界咖啡会议(world cafe)非常节约时间和成本,是一种使公众参与思考政治的极好的方式。”另一位学生用她自己的经历反驳了文献中出于成本原因反对公众参与的观点。“在我所阅读的文献中,选举产生的代表因为预期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而不愿让公众参与决策,而咖啡会议则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好方法。”然而,在对于该学习过程的评价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确信公众参与及思考能实际上影响政策结果。最后,对于学生来说,这种在小组讨论中解决较宽泛问题的工作方式需要他们培养自己的参与以及思考能力。一位学生认为,这种学习过程的成果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其中来,甚至在讨论时间之外大家也热情高涨。团队协作体现了团队精神。”

学习如何用政治思维倾听以及如何评价政治生活

政治参与及思考的本质问题是如何用政治思维倾听政治世界,以及如何作为一个有智慧的表演者和会思考的观众来评价政治世界。学生学习情况的记录显示,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一位学生认为这种训练证明在决策过程中倾听公众意见是有意义的。“我们对我们在恩尼斯镇得到的一些人的回应感到很高兴。这证明公众也可以对决策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一位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名学生对民主思想的核心准则提出了质疑,她不认为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精英团体在智力层面具有优越性。“我觉得‘选举产

生的代表比平民在司法过程中更有资格作出决策’这一说法完全是谬论。因为在当今社会受教育群体增多且各种信息资讯非常容易获得。如在讨论至2020年如何使恩尼斯镇变得更好这一问题上,选举产生的代表对于该问题的讨论结果和想法与公众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同的含金量。事实上,公众往往能够提出更好的意见。”

总体上来讲,学生有机会认识决策领域的各种不同的观点及不同个体的决策能力。PBL为多元观点的形成提供了途径。而在课堂上,这种观点往往不能被接受。可以说,PBL/公众参与学习使学生对这些观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且在与选举代表互动的过程中,学生们发现了许多令他们意想不到的问题。从个人层面来看,许多学生从两方面认识到了他们作为政治行为体和观察者所具有的作用。其一是他们如何与别人沟通:“我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沟通及倾听能力,尤其是当我在一个团队中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一起工作时”。其二是他们如何应对和处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有关身份和地位认识的问题。

教学结果

从教学的视角也有重要的成果。显然,PBL教学法的限制之一是没有参与者以前参与过任何形式的PBL。到今天,我们学生的教育经历很大程度上形成于一种“教学范式”,即用传统的方式上课讲座;而PBL教学法要求他们走向一种学习范式,这种范式更强调学生在学而不是老师在教。如果PBL在大学期间就被引入,并与传统教学方法相联系的话,也许PBL的效能可以被优化。

这个教学法面向的是一个很小的毕业生小组,我们不禁要问是否有可能将其复制到较大的本科班中去: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在我们的经历中,这个教学法中决定性的要素是问题概念化和相关规划以及支持它的本地环境的培养。在这些要素准备就绪之后,最大的限制是学生用于探讨问题时间。对更大的课堂来说,这样的时间投入显得更为必要

保持宽松的促进

如前所述,最初学生们发现模糊不清的问题抽象的本质很难理解。面对这样的难题,教师难免会想亲自介入去缓解学生的挫折并促进问题解决。但是,学习结果证明,给学生时间去阐释问题是很关键的,因为在基础的阐释阶段和之后寻找解决办法的阶段同样有很多可以学习。这要求指导者对PBL教学法有信心,并在有些情况下必须拒绝帮助学生澄清问题。

在对这个练习的评估中,学生表示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会选择PBL教学法而不是传统教学方法。仍然,我们并不确信这表明更加传统的教学形式应该让位:显然混合的教学风格和方法是有价值的,PBL只是其中一个。这种混合确保了功能性和陈述性知识之间的平衡。然而我们注意到,传统的以讲座或教程为基础的方法,也可以支持和提高PBL教学法,或可以采用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风格,从而在新旧教学方法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最后,从教课的角度,PBL对小组合作有着高度的关注。简单地使学生形成小组不能保证这些小组能够有效的运行,必须投入充足的时间是学生认识到小组合作的潜在优势与隐藏陷阱。同样,寻找方法预防小组中“搭便车”的现象也有一定难度。在这个练习中,一部分任务被平均分配给小组成员,但学生大部分对这一过程持批判态度,并不认可其价值。

同伴结果

鉴于这个教学法包括 PBL 和公民参与元素, 其对于合作伙伴的需求需要格外留意, 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这一现实政治的情况中, 关于选举代表和行政人员有时不同的结果需求也要加以考虑。对于选举出的代表来说, 可以看到可靠的过程和有形的结果是必要的。对于行政人员来说, 可操作的和有形的结果也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 在一个单独的学期内挑选教学计划实行的时机并不保证学生能达到这些结果, 相反, 部门员工必须保证合作伙伴的决策结果送达课堂, 这需要大量的额外的工作时间。同样地, 作为这个项目的结果, 现在存在的潜在协同工作的研究议程、合作成果, 和 PBL 的过程都尽可能减少对时间的要求而优化结果。

公众结果

最后, 我们认识到, 被我们邀请来参加远景规划的公众也需要看到一些成果。显然, 远景规划的行动很难在短期内实施, 然而, 大部分关于公众政策中公众参与的文献指出, 当公众如文中描述的一样进行了政治参与却没有听到后续消息时, 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因此, 这个项目希望可以产生短期可见的政策成果, 从而促进对公众意见反馈的收集。这一成果正由一组来自研究生通讯技术和电子学习课程的学生发表, 他们通过研究电子快讯、电子经济(目标是更年轻的人)、一个刊登所有产出报告的网站和一个电子学习包裹去帮助他人持续了解该项目的动态。

结论和接下来的步骤

我们对于 PBL 教学法和学生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经验测试产生了有价值的结果, 并且使我们初步得出结论, 在与传统教学“演讲风格”的比较中 PBL 显然能“坚持自己”。它远不仅是概念知识的获取, 而且使学生自主学习、解决问题、收集信息、自我评价等技能获得提高。当然在这项练习中, PBL 也促进了课堂互动的整体性, 提高了学生的连通、参与、主动性和预习态度。从更基础的政治学的视角, 在参与 PBL 的学生和公民参与中存在显著的合理的教学争论, 这使政治学院系和学生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 以这种方式集成到课程与常规教学中。然而, 从一个单一案例去归纳是错误的。因此, 这项练习一个更深远的结果已经被发展为一个更加被严格评估的、跨部门的过程在政治学教育中使用 PBL。这种“PBL 政治实验室”将在 18 个月内建成, 涉及范围更广的政治教师, 评价不同的 PBL 与传统方法对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作用。从这个实验室中, 将产生对于加强 PBL 教学法在政治教学中的使用更广泛和显著的贡献。

[翻译: 郭晓琼、胡阳阳、王 燕、杨 雪]

[责任编辑: 李 萌]

[校对编辑: 胡阳阳]

赴美留学经验分享

刘奇峰*

我是刘奇峰，现在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政治系的博士候选人，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量化政治学、政治地理学和中美关系。2014年有个珍贵的机缘，让我得以前来天津南开大学风景秀丽的校园，和南开国际关系系的师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国关人做进一步的交流，收获良多。

南开的新科优秀博士生迟永很热情，要我给《新视界》写个稿，和南开的师弟师妹分享留学的经验。承蒙他的错爱，在此就不揣固陋，希望自己的经验能为来者省去一些在学术曲径上摸索的时间。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在台湾成长、求学，在赴美之前从事媒体工作。当时能有机会访问到许多台湾和大陆的国关学者，因此兴起了一种“有为者、亦若是”的豪情，于是着手准备申请美国大学博士班，之后经过种种考虑，选择了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系就读。

南卡大的政治系，在国关这门子学科上有悠久的传统。起初作为南卡大的主流大系，它的研究途径主要以区域研究为主，以国际组织、国际合作与自由主义为专长，网罗了一批名师如研究欧洲整合的普查拉（Donald Puchala）、雷格利（Charles Rigley）和研究美国外交体系和决策过程的罗赛蒂（Jerel Rosati）等学者。90年代末，本系网罗了专研国际冲突与联盟理论的名师史塔（Harvey Starr），也赶上了美国政治系量化的大潮，全系的研究方向开始向主流转向。

我进入南卡就读的时间点，刚好处于本系转型期的末段。台湾的国关研究生教育和大陆很近似，以文本与历史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注重个案与区域研究。我的硕士在台湾淡江大学的美国研究所，论文研究的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袖手旁观（Hands-off）”政策。当时写论文的时候，完全沉浸于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当中，引用最多的档案除了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FRUS）”档案集，还包括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等。

赴美之后，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美国的主流政治学开始走向定量及科学化，就算是所谓的“质性”研究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法，而非常注重背后逻辑的推演，以及多重案例的比较。原本打算延续中美关系研究的方向，但是导师史塔鼓励我，应该把视界扩大，跳脱两国间互动的框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各个强权（great powers）。

很多师弟师妹在国内可能跟我一样，以比较传统的方式从事研究工作，有的师妹可能会自己苦苦摸索定量研究方法，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要先做好思想准备。目前国内和许多美国大学在寒暑假都会举办定量方法研习营，如果有时间不妨报名参加，一方面可以熟悉

* 刘奇峰，男，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政治系博士候选人。

【编者按】本期收录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作者将目光投向至今仍纷争不断的叙利亚，简要分析了叙利亚局势并认为对于巴沙尔政府和反对派来说，谈判与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但之前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努力都收效甚微，可见叙利亚的和平之路还很漫长。第二篇文章探讨的则是何谓经典之作，作者认为直击事物的本质或提出重大创新并有承前启后之贡献的作品方能与“经典”二字相衬。的确，国际关系经典之作也具备了上述特点。

The Dispute in Syria

Yiqun Ma*

As to the background, we all know that Syria is a Middle East country in which almost 80% of the people believe in Islam. Among them, the majority believe in Sunni, while the Bashar (Syrian president) family comes from the minority Shi'ite which only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12%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So we can see, there is a hug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ost of the civilians. Actually, the fact is most of Syrians can not participat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besides, the corruption and the rate of unemployment are other big problems.

We are going to focus on the dispute about the Bashar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s. Inspired by the revolutions occurring in other Arabian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suffers from the recognition of author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1, the oppositions started to take actions to protest the government,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pute. By the time of March 5, 2011, the conflicts escalated from demonstrations into the civil war.

In order to finally settle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Syria crisis, I think the settlement should contain the process of mediation and negotiation. The reasons are:

At first, the two sides did not want to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so the Arab League try to participate in solving this dispute. They proposed that both sides should begin to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and stop the violent activities. Unfortunately, this sort of mediation turned into a failure. After a few months, Arab League drew up a draft of proposal, we conclude it into four main points: Firstly, require Bashar to hand over the power and establish a coalition government. Secondly, set up a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all the violent activities. Thirdly, re-organize the Syrian army. Plus, prepare for the election within 3 months. However, this proposal did not work either.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Arab League, the UN began to interfere to the crisis in Syria. In 2012, the UN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Kofi Annan began to serve as the special envoy, trying to

* **Yiqun Ma** is a maste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Wenting Ou** from Law School of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lso mad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is article.

mediate the conflicts. He established a monitoring mission and tried to persuade both sides to cease fire. Nevertheless, the mission finally came to an end on August 19, 2012, which implied that the UN's persuasion did not change the situation either.

Besides the mediation mentioned previously, there are also some attempte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Syrian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s. On June 22, 2014, the UN prepared a 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in Geneva, in which both the Syrian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s have promised to participate. However, up to now, this negotiation has not achieved any success.

Last but not least, we would like to analyze our view towards the dispute settlement on behalf of both sides.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the situation in Syria now is very advantageous for Bashar's government. We know that the opposition forces are mainly supported by the US, but now the US focuses on Asia-Pacific. Thus, the Bashar may no longer be afraid of being punished when he attacks the oppositions. Plus, the terrorism problem is very urgent in Syria, so the Bashar may get the so-called legitimacy to attack the oppositions in the name of anti-terrorism. However, because of the hug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is regime and Syrian people, Bashar still needs to negotiate with the oppositions and tries to cooperate with them. We believe that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ll be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e Syria's security and stabilization in a long term. At the same time, for Syrian opposition forces, now they are not fully supported by the US and are attacked by both the Bashar government and terrorist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wise for the opposition forces to negotiate and cooperate with the Bashar government.

In a word, taking all these into account, we can see there are still some distances between the dispute and peace in this country. When faced up with the urgent terrorism, it is reasonable fo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help build up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that is to say, more effective contacts between Bashar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s are still essential.

Timeless Classics

Yangyang Hu*

Why something could be called the classic? I take it for its quality and enlightenment, especially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future. As we all know, a genius work might only be fully acknowledged or really understood when people look back. Thus the classic itself may be recognized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I perceive that the classic should be treasured by all generations and ours being no exception. In fact, it is not easy for people to put the "classics" label

* **Yangyang Hu** is a juni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on a piece of work.

First of all, when something well got the essence of a question or puzzle even just for one aspect, then it can be called a classic. To conclude, we can say a classic is an essence. And it helps people construct the foundation of a knowledge system. For instance, Newton's 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is just a typical classic, since it well explains the puzzle why the apple falls to the earth while not flying to the sky.

On another occasion, when something starts a new thinking or analyzing method, it can also be called a classic. That is to say, it provides its followers with a good topic or good point. For example, classic music is a group of music piece that not only for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but also for its effect as a start point. As we can see, classic music offers basic elements for the later popular music.

What's more, when we mention these two characters, we generally combine them together on account of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hip. By the way, it is exactly the best retort to the argument that the classics represent the wisdom of the past. Knowledge as well as arts or a cultural template of some sort, in fact, is characterized by continuity. Otherwise, the present pattern is based on the previous experience that has been proved to be true or appropriate. In consequence, we can not simply say that the past classics bear no relevance to the current fruit, or put another way, nearly all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has its own origins to the past wisdom or past classics for the sake of continuity.

All in all, why something is called the classic? That's not done at random. Any classic, in reality, represents some sort of essence or origin. And people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beneficial drops to create new wonders. Therefore, we can say, a classic is a classic, and it should be treasured by all generations and ours being no exception.

[整理: 李志宇、李冰莹、姚丽丽]

[责任编辑: 姚丽丽]

2014 级迎新特辑

美丽的南开，你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青春伴随她。

大中路旁杨柳翠，新开碧波映晚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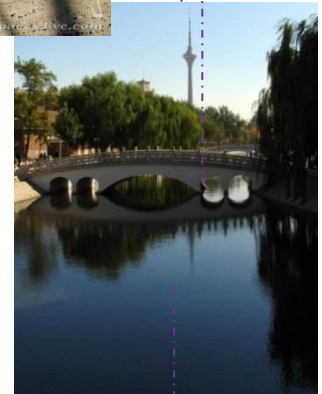
古钟悠悠铭校史，主楼巍巍塑英华。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一生去爱她。

敬业广场书声朗，马蹄湖水映荷花。

公能校训记心上，月异日新竞芳华。

今日湖畔放声唱，明朝建功在天涯……”



迎新特辑

【编者按】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南开园里又迎来了一批新鲜血液，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也因为你们的到来而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2014年的9月，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大学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也是一个熟悉的词汇，如何才能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呢？师兄师姐们是如何度过他们的大学生活的呢？希望这一期的迎新特辑可以带你走近大学生活，给你启示。

【经验分享】

这里是你的大学

郭晓琼*

我即将踏上毕业的一年，而大一的你们才刚刚来到。

我记得，大学前的那个暑假，我一直在好奇，传说中的大学究竟什么样。

我还记得，当我终于上完大学最后一门课，结束大学的最后一门考试时，我没有感到所期望的如释重负，而是充满疑问和感慨。我不禁想，这就是我的大学么？我在大学里究竟学到了什么？

在我看来，大学是一座一个人走的迷宫。每个人初入大学时都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学识兴趣都不尽相同。四年后，每个人也从不同的出口走出迷宫，奔向不同的未来。然而无论未来选择进阶更高的学术殿堂、去更广阔的海外深造还是踏上就业的独木桥梁，我们在寻找出口的时候会迷路、会绕弯，然而最终却肯定会走向一个自己选择的终点。

大学这个迷宫，与高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自己迎接其间的所有挑战。当然前提是你愿意发现并参加挑战，而不是随波逐流地度过大学四年。在大学里，你会发现自己突然多出了许多自由，不论是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思想上。你可能经常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自习……朋友们并不总能陪伴你，但正是这自我的小空间让人思考和成长，在其中你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要是非得说大学里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正确，我唯一想说的是你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你要确立自己的目标，你要慢慢培养自己实现目标的能力并去实现它。这里是你的大学，对于你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家人、老师、朋友的意见可以参考，但终究你应该自己来把握。

我祝愿你们四年之后能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和绝伦的英语技能，具备严谨的学术思维和有效的科研方法，具备超强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具备一身可靠的执行力和出色的表现力……以上，能做到自然最好，做不到却也没关系。因为这里是你的大学，你的目标、

* 郭晓琼，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1级本科生。

终点、意义和价值，除了不能偏离正确的三观之外，实际上都在你的一念或数念之间，重要的是大学之后你自己究竟能否有收获。当你在毕业时问自己，我在大学学到了什么时，希望到时你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当然，现在你才大一，大学四年对你来说有无数改变的可能性。何不先随意的去尝试各种领域，与自身契合的梦想也许就在其中。如果你发现课堂知识特别能引起你的兴趣，且专业课成绩优异，说不定你对国际政治的学习很有天赋，那就多读些专业书，多看些新闻，多听些学术讲座，多思考；如果你发现你在社团和学生会中干得很好，说不定你的组织沟通能力很棒，也许各种创业、竞赛项目会是你的强项并助你提高能力；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英语在未来会派上大用处，或者你本身英语很棒，那你千万不要放松英语学习，每天保证一定量的英语输入和输出，无论是什么形态，未来它能帮助你提升境界；如果你有独特的爱好如摄影、舞蹈、唱歌，千万别放弃，加入社团积极参与活动，也许哪天你的爱好就成了你的未来从事的职业……因为这是你的大学，所以你的一切特长和天赋、资源和想法都可以随意组合，但前提是你要学会专一、坚定和忍耐。

在你的大学里，你可能突然发现有许多自己想做的事。最常见的就是你想要好成绩也想要很多的社会活动。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时候很难面面俱到。规划可能是合理安排时间和精力的好方法，也许多面选手的成功经验就在其中，但是不要被规划束缚，能有时做灵机一动想起来的事会让生活轻盈许多。此外，比起兼顾，专一在一个领域可能更加有效率，这时候则需要舍弃。

初入大学的灿烂日子里，可以迷茫一下，但却不必慌张。况且大一、大二较重的课业也没有给你过多思考未来的时间。保持一颗好奇心，不必急于求成，只要努力脚步不止，在繁忙的大学生活中不断观察、劝告、纠正和鼓励自己，相信我们都可以有所收获，可以从容、自信的过好我们的大学生活。

Welcome & Fighting

冯晓璇*

Hello,14 国政的“小鲜肉们”，我叫冯晓璇，是 12 国政的一员，欢迎来到政府学院国际政治专业这个大家庭！

时间飞逝，踏入南开之门已经两年。回首走过的路，我时而“步履蹒跚”，时而“大步流星”，虽然很多细节都已经忘记了，但是仍然有很多沉淀下来的东西，这也是我想与你分享的。

学习：南开园中不乏学霸，他们是你学习、借鉴的对象。千万不要认为进入南开大门就像进入了保险箱，不要认为不学习不努力仍然可以在毕业后找到好工作，或者进入像南开一样的高等学府继续你的学业。大学中，作为一名学生，你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学习。希望你能

* 冯晓璇，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2 级本科生。

利用好图书馆、自习室等资源，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和综合实力。此外，希望你可以多给英语一点“爱”，让它成为你运用自如的工具，这不仅对你的专业课程的学习有很大帮助，而且会为你打开很多扇门。如果你对英语学习很有兴趣或者有些困惑，欢迎来骚扰我哦。

社团活动：南开园中大大小小的社团总有一款对你胃口。希望你能在“百团大战”时加入一个你感兴趣的社团，让它成为你闲暇时间的“伴侣”。在我大一的时候，我有幸成为了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一员。这不仅让我每个周末都沉浸在歌声的海洋中，在合唱团中结交的好友更是我整个大学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希望你和我一样，在社团活动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宝藏。

运动：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运动真的是你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周末相约三两好友，打打羽毛球，踢踢足球或者游游泳都是不错的选择。大二下学期开始，我坚持一周去三次游泳馆，一学期下来都减肥了呢，如果你想来本部游泳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哦。

心态：在我进入南开园之前，我的学长学姐就曾告诉我，要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你要知道，成长路上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你会遇到棘手的问题，也会遇到强劲竞争对手。在你采取任何行动以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好开端。就拿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吧。大二下学期，我有幸参与到由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优秀本科生项目中，获得了去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交换学习的机会。在等待审批期间，焦虑与心急是难免的，审批的最后阶段更是在期末考试周这个让我倍感压力的时期进行的。即使这样，我还是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一切，甚至在一天之内，在考试结束后赶往北京提交材料。我不断告诉自己，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微笑面对。最后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我还是没能成行，但是整个经历让我成长，让我知道凡事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心态决定一切。

短短的几行字或许无法告诉你大学生活的真谛，但我希望它可以成为值得你借鉴的小小经验。如果你在学习，生活方面还有小困惑小疑虑，欢迎到本部“骚扰”我哦。

请带着信心和憧憬开始在南开园的生活吧 Welcome & Fighting!

大学生活之我见

杨至远*

各位2014级的新生们，作为一个即将步入大三的老生，我这里有一些自己对于大学的看法想和大家分享。

首先，从你们进入大学开始，一个崭新的世界就此展开，你们在之前的应试教育中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会受到深刻的影响。不仅仅是学习上，生活上，待人接物上乃至对于某些特定事物的看法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容应对这

* 杨至远，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本科生。

种变局，过上被许多人称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

学习上，你们不再有高考这个统一的目标，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做出自己的安排。因此及时拥有自己的计划是十分重要的，这个计划应该包括短期和长期两个部分，既要顾及目前的成绩，也要考虑自己未来的发展，是考研 出国还是尽早开始工作，所有的选择权都在你们自己的手上。所以我建议大家应该制定属于自己的计划，自主学习，才能使自己的大学生活过得充实。

生活上，社团和宿舍将成为你们最主要的根据地。对于前者，学长的经验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有所选择，不要把战线拉得太长，一旦加入就应该全力以赴地为组织出一份力，这样在最后离开的时候才不会留下遗憾，同时也应该处理好社团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关系。对于宿舍生活，学长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个十分融洽的宿舍人际关系，因此面对来自五湖四海拥有不同成长轨迹和价值观的同学，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颗包容的心，平时多多参加各种活动，聚餐，出游，你们的大学生活将会丰富多彩。

最后，旅行、爱情、友情等等都是大学中重要的元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的视野将得到极大的开拓。总而言之，多元 包容 创造力 这是学长对大家最大的希冀。

【学习攻略】

大学学习之转专业

高振华*

很高兴能通过《新视界》和学弟学妹们分享关于转专业的一些事。大学生活相比于之前的生活自主地多，机会也更多，但同时更加需要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关键时刻做出合适的决断。

闲话少说，我是从国际政治转到城市管理的，在转专业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经验与教训。

转专业分为在本院内转和向其他学院转，无论是院内还是院外，首先明确一个观点，不要认为上了大学就不用学习了，学习成绩作为一个可以比较公平地被量化的指标，在大学各种荣誉的评定，转专业，双辅修，找工作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底线是 85 分，当然，越高越好。同时要注意的是，随着课程的不断变难，大部分人的学分绩是一直往下掉的，所以，想在大三时还保持 85+，大一要格外努力。（学分绩怎么算不用太担心，实质就是把各科成绩的加权平均。）

先谈谈院外转专业。今年第一次大类招生，情况跟去年略有变化但其实不必过于担心。首先，一般情况下，能转到院外的学生人数不能超过该专业总人数的 10%。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班 50 人，在有六个人通过考试取得转专业资格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个人要被淘汰。所以，学分绩在此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学分绩太低的话，别的学院也有可能拒收。其

* 高振华，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3 级本科生。

次,转到不同的学院要参加的考试不同。转专业考试是由被转学院出题。比如转经院、商院这些热门学院的话,要考数学和英语,转文院的话,则要考语文方面的一些知识。每年都会有很多同学被调剂到咱们院,咱们院也是转出学生比较多的院。总之,有志于转专业的同学,要多向学长学姐和老师打听信息同时做好准备,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另外有两点强调。第一,总是会有人转专业失败。不要气馁,大学里的机会很多,还有双修或别的出路。而且,这就像围城一样,很多人想离开自己的专业,却又有许多人想进去,文科类专业大同小异,学好数学和英语是王道。第二,转专业是一件很耗费精力的事情,要认真考虑,慎重抉择。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院内转专业。院内转专业没有人数限制,理论上提交申请参加面试都能过,对成绩的要求没那么高。但另一方面,由于都是同一个院的专业,所以很多方面都很相似。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兴趣之所在,省得增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由于今年第一次大类招生,有些政策可能会有细微的改变,同学们要多和辅导员联系,咨询信息。转专业是可以改变人生轨迹的大事,最好多想想:如果做出决定,多年以后会不会后悔。最后,衷心祝愿同学们在大学时期生活快乐,心想事成!

【班级风采】

大三,梦想开始的地方

于凯玥*

三年前,一纸通知书让我们相遇,29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相聚南开国政,组成了合作共赢的集体。在经过了大一的迷茫,大二的懵懂之后,我们共同收获了大三的成熟与自信,大三的生活不是晚秋,而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看看班上的兄弟姐妹,虽然已经共渡三年了,可仿佛相识就在昨天。他们的脸庞都是那样的可爱,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疯狂,一起为了集体荣誉而努力拼搏。青葱岁月,我们一同走过,一同成长,岁月加深了我们的情感。

在忙碌之余,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次交谈和相聚,珍惜每一次班会和自习,珍惜我们心灵与心灵之间的默契。开学之初,在军训的共患难中我们初相识;班级聚餐,每个人大秀厨艺,加深了了解;男生节女生节,烛光、蛋糕、爱心早餐,我们用独特的方式互诉感谢;山西和香山之旅,更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班集体的温暖和快乐。如此种种,都将成为最难忘的记忆。

大三的日子来得快,走得也快。

我们似乎还怀着初入大学的心情,不相信草地上那些花会凋落,不相信教室外面的那棵树会枯萎,不相信大一大二日子将会变成档案里的记录,不相信曾经的班级将会变成网络里的校友录,但大三还是来了,又匆匆地走了。但是我们一路走来,有美丽的青春,有似水

* 于凯玥,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1级本科生。

的年华，我们经历过奋斗的充实，在属于我们的青葱岁月里仰天挥汗，公演芳华。

我们背着各自的行囊，在前进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过去的已渐行渐远，曾经的欢笑与汗水都将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巨大动力。我们怀揣不同的坚持，有的为出国深造准备托福雅思，有的为国内读研温习教材，有的为找到理想的工作积累经验，虽然理想不同，但我们却有着共同的信念，厚积薄发，为达目标而丰健羽翼。

这个告别大三，即将步入大四的班集体，相信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11国政的每一个人都将实现梦想，越走越远。

光荣梦想 慎思笃行——致 2012 国际政治

刘文秀*

31张鲜活笑脸，6名男生，11个省份，4种民族，9个寝室，1颗齐心；交织成网的朋友关系，相视而笑的默契眼神；无数个跃跃欲试的梦想，以及多少个露水晨曦光阴昼夜里为之辛勤的付出与奋斗……冥冥之中的命运将这样一群人牵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共同构筑。

这些都是属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12级国际政治同学的关键词，也是如流星般划过并停驻在我们青春生活里的璀璨印记。春去夏往，秋至冬来，大学生活虽然缤纷多彩，但我们也从不要忘记学习本务，课业学习，学生工作，社团活动，文艺讲座汇演，社会实践，科研项目研究，学术论文，专业实习，融洽积极的学习氛围，轻松自如的学习交流，紧张刺激的期末考试周，丰富多彩的寒暑假……我们和无数个匆匆行走在南开园里的学子一样，但又好像拥有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琢磨的独特的不一样。

有人说大学是成人社会的缩影，每个人都在提前预演，在我曾经无数次畅想过的大学梦里，自由、独立、无拘无束、任我飞翔。但现实生活里，我们却都是在“披着镣铐跳舞”——需要遵守规则制度、章程秩序，需要背负和承担。幸运的是我在我的班级里看到了每一个人身上的没有分别的坚持和笃行，或许我们背负的羽翼还未丰满，或许我们的成就相比许多人而言只是滴水之于汪洋，但是在这样一个满载光荣梦想的集体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支撑自己继续坚守，继续前行。

大学两年一晃而逝，我们也一步一步从青涩新生变成本科高年级，和这个班集体一起经历了很多，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断层里都记载着许多的欢笑和喜乐。除了共度无数次课程以外，我们聚过4次餐，和理科班级联过谊，作为学长学姐和下届班级交流分享经验增进感情，盛大庆祝女生节，一起参加趣味运动会拼尽全力为班级争光，开过许多例行的班会，也一起“爱过”公能素质测评，活动不算多，在大家的互相磨合里有摩擦有挫折，甚至也有遗憾，但毕竟我们现在正端正站在大学四年的中点之上，回首往昔历历在目，我作为12国政的一员没有对我的大学班级失望和后悔过，当然班长的另一重身份让我对这个集

* 刘文秀，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本科生。

体付出的更多担负的也更多,也因此也许爱的也更多。我想未来我终会将这些珍贵的回忆擦拭,串成一斛莹润珍珠。

青春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沿途开满花朵,道路暗藏成长的荆棘。我知道一路上若不修炼成坚固盔甲无法安然度过,但同时更知道彼此之间的相处需要纯洁的赤诚和无悔的热忱。我们都是跌跌撞撞离开父母荫蔽、将成长起来的孩子,未来的路还很长很远,互相扶持才能走得扎实,搭着臂膀才能力克艰险,走到柳暗花明处才发现原来生命里里四处都是惊喜,都是奇迹。

2013,这是属于我们的国政

耿欣伟*

大概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分散在天南海北的36个人都收到了一封邮件,在那之后,他们纷纷收拾行囊,带着家人朋友的祝福,踏入了南开园。

还记得报到那天晚上,黑板上写着“巍巍国政,勇担大任”八个大字,这次班会上我们做了自我介绍,正式地互相认识了。从此开始,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又因36个人的加入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报道后不过三天,我们进入大学后的第一课——军训就正式开始了。

军训时政府学院的学生不分专业,同为铁七连的战士,一起踢正步,一起练合唱。“刚铁七连,冲锋在前,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这震彻天地的口号在去年夏天继续在迎水道被一群新生喊响。军训在磨练我们的意志的同时,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在这段时间被拉近了。

军训之后,我们向往了一年,为之奋斗了一年的大学生活就真正开始了。随着课上的交流,班会,聚餐等活动的促进,13级国政的同学们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大家庭。室友之间互相照顾,互相包容;宿舍之间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同学之间互相尊重,相处融洽。大一一年的时间,说长也长,长到我们就在这一年之内共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而这一年说短也短,短到我们踏入大学的校门不久之后就成为了大二的学长学姐。

在这一年内,我班开展了很多活动,有的是为了班级荣誉的建设,而有的只是单纯地为了服务同学。

首先要说的就是五四评优。去年的10月,2013国际政治团支部以“真实与谎言”为主题开展了第一次团日活动。通过一人叙述故事,观众判断真假的方式形成各个团小组之间的竞争关系。此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各个小组之间的交流,还加强了同学之间的默契。一个月之后的“童话国”以政治学联合团支部为单位展开,要求各组以短剧形式重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时期。同学们在诙谐幽默的环境下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将逝去的时间重现在了讲台之上,这在增进同学友谊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体验式交流学习的氛围。在今年春暖花开的三月,最后一次团日活动以反腐倡廉理论学习的形式展开,同学们不仅在这次活动中深刻体会了“允公允能”的意义,也提高了同学们评论时事热点的能力还有专业知识的灵活运用程度。

* 耿欣伟,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3级本科生。

严肃过后，接下来介绍一下我班的其他活动。一次“五月的鲜花”，国政人在政府学院合唱团中贡献力量；两次聚餐，13国政的同学迎来的大一的开始，送走了在迎水道的生活；三次运动会，尽管我们没有获得多么高的奖项，但了解重在参与的每一个人都在其中获得了乐趣；一次一次的主题班会，有的是辅导员老师对我们的嘱托，有的是学长学姐们介绍给我们的经验，有的则是同学们一同欢乐的笑声。

13国政就是这样，我们不强求在哪个方面出类拔萃，我们要的是一个温馨有爱的大家庭，是一群可以同甘共苦的朋友！

· · · · · · 危机公共外交 · · · · · ·

危机公共外交指“国际行为体在已经或者可能即将处于危机状态的情况下，通过应急公共外交，梳理正面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以化解其不利影响，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具有突发急迫、利害重大和灵活敏感等特点。中国的危及公共外交存在安全与外交相脱节、常态与危机相脱节和战略战术相脱节等问题。未来应该在深化外交安全意识、发展常态公共外交和主动谋划议程设置等方面发力。

摘自黄忠、唐小松：《中国“危机公共外交”：形势、问题与对策》，《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3期，第39-48页。

[整理：李天翼、姜忆楠]

【编者按】此书目由国际关系系的老师制作,适合对国际关系学科感兴趣的低年级本科生使用,是一份尽可能精简到最少的书目,目的在于帮助大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理论流派有基本的了解。2013年的《新视界》迎新特辑就采用了这份书单,而今朝花夕拾,就是因为经典永远具有魅力。

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入门推荐书目

一、国际关系概论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原版影印】

卡伦·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康威·汉得森:《国际关系》(金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威廉·内斯特:《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姚远、汪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约翰·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宋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邢悦:《国际关系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二、国际关系理论

[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国际关系理论(第3版修订增补本)》(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加]罗伯特·杰克逊:《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宋德星、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宋伟:《国际关系理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三、国际关系史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香港: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美]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美]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英] A. J. P. 泰勒: 《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加] 卡列维·霍尔斯特: 《和平与战争: 1648-1989 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陈乐民、周弘: 《欧洲文明的进程》,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四、经典著作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英] 爱德华·卡尔: 《20 年危机 (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美] 肯尼思·华尔兹: 《人、国家与战争: 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

[美]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 (第七版)》(李保平、郝望、徐昕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美] 肯尼思·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美] 罗伯特·吉尔平: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 (第三版)》(门洪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美]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美] 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英] 赫德利·布尔: 《无政府社会》(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美]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美]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论》,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美] 斯蒂芬·范埃弗拉: 《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挪] 斯坦因·拉尔森: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

[美] W·菲利普斯·夏夫利: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

阎学通、孙学峰: 《国际关系研究实用研究方法 (第二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少军: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六、美国外交政策

[美]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周桂银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

[美] 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傅耀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资中筠、陈乐民：《20 世纪的美国》，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七、推荐访问网站

环球网 <http://www.huanqiu.com/>

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

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world/>

美国 FP 杂志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美国 FA 杂志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

美国智库 CFR 网站 <http://www.cfr.org/>

哈佛国际评论网站 <http://hir.harvard.edu/>

耶鲁全球在线 <http://yaleglobal.yale.edu/>

中国国关在线 <http://www.irchina.org>

Theory Talks 网站 <http://www.theory-talks.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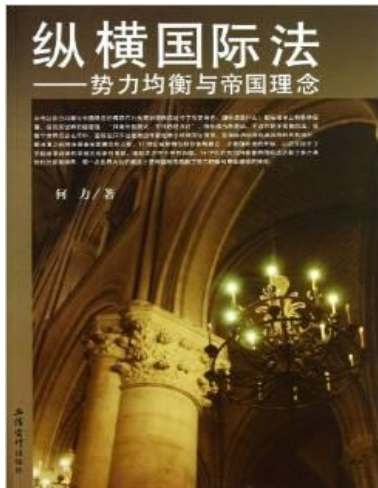
[整理：唐铭兴、高振华、宁鹏举]

[责任编辑：唐铭兴]

[校对编辑：程 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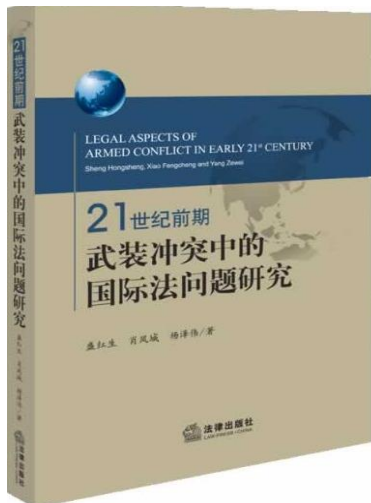
新书架(三)

【编者按】国际法自从产生开始,便以其独特的作用影响着国际社会。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国际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地区争端不断出现的背景下,国际法的影响力更是不断增强。本期新书架以“国际法”为主题介绍相关书籍,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国际法。



何力:《纵横国际法:势力均衡与帝国理念》,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4年。

《纵横国际法:势力均衡与帝国理念》这本书从势力均衡与帝国理念的线索写国际法,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这是国际法学界还没有进行过研讨的视角。《纵横国际法:势力均衡与帝国理念》的基本观点和论点都可以引出学术问题和学术争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及国际政治相辅相成;国际法是在势力均衡的背景下才能产生、发展和生存;国际法与帝国理念格格不入;帝国理念占据了历史的主流,所以国际法只是历史发展洪流中的一小段历史;国际法的发展演变伴随着非国际法因素,体现了殖民主义、侵略和非正义一面;国际法演变到当今,已经成为维护和平、抑制战争、弘扬正义的普世性法律规则。



盛红生:《21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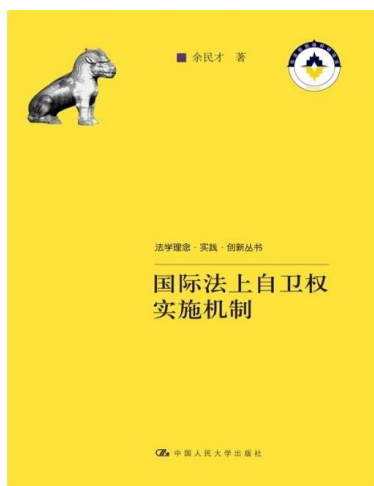
进入本世纪以来,在国际格局出现重大调整、高新技术武器发生质的变化和战争形态面临重大转型的冲击下,有关武装冲突的国际法正迎来裂变和重塑的历史机遇。本书作者不仅论及最新成为关注焦点的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网络战、基因武器、攻击型无人机、自主作战机器人等敏感和复杂法律问题,而且对国际人道法稳定与变化的历史过程和未来走向,作了大跨度的历史考察和高远的战略分析。此外,还从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新视角,就如何对待和适用相关国际法的问题,坦率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刘衡：《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欧洲联盟、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世界，而且处于一个全球治理时代。全球治理是国际法管理全球公共事务的方式。因此，这也是一个“国际法之治”的时代，国际法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和基础。三百多年来，“国际法之治”历经国际会议-国家治理、国际组织-国际治理和国际法-全球治理三个阶段；欧盟体制和WTO体制是“国际法之治”的当代实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表现为“治下”、“治外”和“治中”三个不同时期；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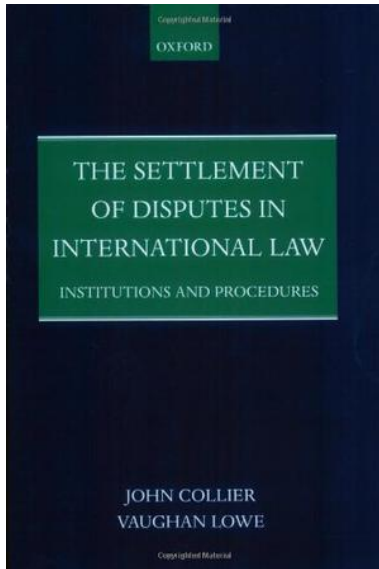
依法而治这三个法治核心要素在“国际法之治”语境下具有新的内涵与外延；“国际法之治”的未来由领袖型国家、共进国际法与和谐世界三个关键词界定。



余民才：《国际法上自卫权实施机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本书主要由前沿、五章和结论组成。第一章介绍自卫权的概念与特征、性质及其渊源，自卫权的历史演进与法律意义。第二章是自卫权行使的实体规范，包括武力攻击、自卫的必要性和比例性、安理会的作用、集体自卫权以及国家责任。第三章讨论的是自卫权行使的程序规范，如自卫行动的对象、地点、方式及其合法性评价。第四章探讨了自卫权在几个现实新问题中的适用性，这些问题是：预先性自卫，先发制人，武力反恐，计算机网络攻击，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暗杀或定点清除，保护海外国民，防止环境退化，以及第51条的修改。第五章分析了我国自卫权的确立及其内容、有效自卫及其行使、我国和平发展中自卫权行使与该战略的关系、我国行使自卫权的实践以及现行适用自卫权的问题与完善建议。《国际法上自卫权实施机制》的最后结论特别强调我国应该重塑自卫安全观，在坚持后发制人的同时，树立积极、有效自卫观念。



约翰·柯里尔、沃恩·洛、安东尼：《国际法中的争端解决》（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John Collier, Vaughan Lowe QC, and Antonios Tzanakopoulos,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14.）

本书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威著作的最新版本，它为国际社会争端解决提出了清晰和全面的分析。第二版保留了第一版的突破性架构，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解决现代国际体系争端的全面视图，除此之外增添了国内法院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证据和律师行为在国际裁判的作用、全球和部门制度之间的主要区别等新章节。

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解决争端的不同方法和机构，主要介绍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方法，并讨论国内法院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作用。第二部分提供了国际法院庭审之前的进行全面检查程序。第三部分重点介绍国际争端解决制度面临的争议解决机制的扩散等问题。本书是国际法律学生和从业者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整理：姚丽丽、唐铭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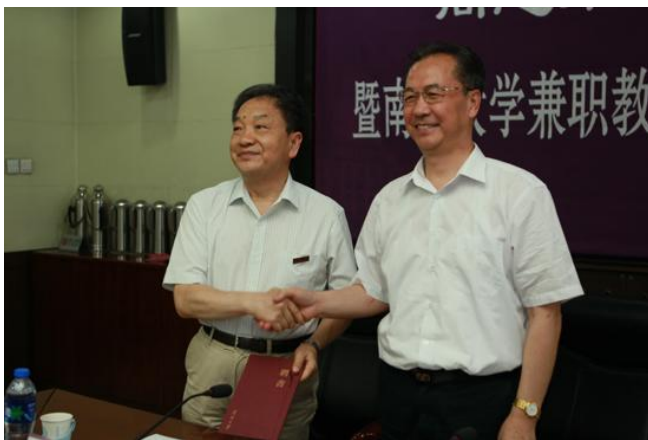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裴 瑶]

♣学术交流♣

李慎明受聘南开兼职教授并做客“周恩来论坛”

(转自南开大学新闻网)6月1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并作为“周恩来论坛”嘉宾在办公楼为南开师生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校党委书记薛进文、副校长朱光磊出席致聘仪式。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负责人以及师生代表参加。

薛进文向李慎明致送聘书并佩戴校徽。他表示,李慎明先生是南开的老朋友,是一位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政治学、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知名学者,他加入南开教学队伍会对学校相关学科发展、学术繁荣、教育教学工作、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相信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会珍惜这个机会,也欢迎李先生常来南开与师生切磋交流,产生更多的学术理论成果。

李慎明向学校的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南开大学是一个神圣而令人向往的学府,与周恩来总理这个光辉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南开就是“厚重”,只有这个词语能够反映出南开在中华民族教育史、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的贡献。他祝愿南开大学进一步发挥文理综合型大学的优势,为党和国家的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在主题为“中国梦,我的梦——信仰的机遇与挑战”的讲座中,李慎明从中国梦的内涵、拥有什么样的信仰才有意义、正确信仰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出发,鼓励大家要坚持正确理想信念,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李慎明指出,中国梦应该是我的梦,每一位中国公民,特别是有志青年,应该把个人的梦与国家、民族的梦高度统一起来,在实现国家、民族的梦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实现国家、民族的富强中,实现个人的利益与追求。中国梦是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统一,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就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国际问题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战略》等。

张睿壮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

(通讯员:刘 志)2014年7月10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张睿壮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为来自校内外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十分精彩的学术报告。论坛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主持。

张睿壮教授首先感谢周恩来论坛的邀请并向师生们简要介绍了他近期在挪威诺贝尔研究所访问和参加相关国际研讨会的情况。在题为“中国崛起的悖论”的报告中,张睿壮教授明确指出,崛起中的中国不会对世界和平形成挑战。他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



受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制约,中国完成崛起仍然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目前远未具备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能力;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国际体系的交往中获益甚多,并不存在彻底推翻现行国际秩序的意愿。对于美国霸权衰落的问题,张睿壮教授认为美国目前仍然具备灵活调整战略与政策以应对国内外危机和挑战的能力,其实力依然强劲。

报告结束后,张睿壮教授同现场师生就民间言论的作用、中国对国际政治秩序的态度、民族主义情绪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第二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成功举办

(通讯员:姜忆楠)2014年7月12日,第二届“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南开大学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全球问题研究所,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



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南开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西北

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等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本届论坛以“全球治理新变化与国际秩序变革”为主题,与会学者就“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变革”、“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全球治理研究与全球学的发展”三大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雪冬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拓教授分别主持了相关议题的讨论。

在“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变革”议题上,与会学者认为全球政治发生了显著变化,气候谈判、全球正义等新的全球性议题的出现呼唤全球学与全球治理的深化。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全球经济整体利益已紧密地联在一起,因此,中国有能力、有必要从多层面、多维度考虑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定位与战略;在“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议题上,与会专家们认为全球治理存在治理失灵与公平缺失等问题,应该注重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注重治理的多层次、多主体,实现治理精细化;在“全球治理研究与全球学的发展”议题上,学者们讨论了全球化的概念界定、治理模式和存在的问题,就全球学的学科发展建言献策,认为应重视全球学的人文主义价值关怀,整合多方资源,对现有的全球学与全球治理研究力量进行研究方向的分工,做深做强,实现优势互补和学科发展的连贯性。

与会学者还就中国的国际定位、新型大国关系、不同学科的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四届“全国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成功举行

(通讯员:姜忆楠 摄影:缴懿鑫)7月13日,“国际关系现实与热点问题:理论、方法与实践”——第四届“全国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在范孙楼举行。来自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南京大学、上海社科院、吉林大学、辽宁大学、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江苏省委党校、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20多位青年学者及博、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

本届论坛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办,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承办,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闻道》编辑部协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在开幕式上代表学院做了发言。他说,国际关系学科要建立学术共同体,离不开相互间的交流。随着研究环境与条件的改善,国际关系学科能够举办更多活动。国际关系研究既要有理论研究,又要有现实研究,要有创新意识,需要更多青年教师和学子的参与。南开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科具有自身特色,随着研究队伍的年轻化,未来将大有可为。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韩召颖教授代表主办方国际关系系进行了发言。他说,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已经坚持了四届,很不容易。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学术论坛办成锦标赛,坚持下去,越办越好。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奚先来副教授表达了对论坛的支持。

本次论坛由“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与发展”、“世界政治的新现象与特点”、“中国的战略、议题与对策”和“国家的对外行为”等专题讨论构成。参会代表和点评嘉宾围绕近20篇研究论文进行了深入而坦诚的讨论。数十名来自南开大学相关院系的同学也参与到相关讨论中来。与会代表与参会同学纷纷表示从学术交流中受益颇多。

“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始于2011年9月1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首届“津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生学术论坛”,是由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生为提高自身研究能力、自主发起的面向国际关系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论坛,目前已经成功办到第四届,影响力与辐射范围逐年扩大。

中欧论坛创始人高大伟做客南开谈他的“中国梦”

(转自南开大学新闻网)天气炎热,他仍一席正装,用流利而“接地气”的汉语与听众交流。7月28日,知名国际关系专家、汉学家、中欧论坛创办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高大伟(David Gosset)做客南开,为2014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外派汉语教师岗前培训南开大学培训班学员讲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他的“中国梦”。交流处、跨文化交流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出席。



高大伟指出,21世纪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呈现“多极化”的局面。守成大国美国、一体化程度日渐加深的欧盟与处在复兴阶段的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三大全球性力量。非洲与拉丁美洲也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

高大伟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部分西方势力对中国的认识如“井底之蛙”,存在偏见。他表示,西方对中国往往从文化、经济、政治、战略四个维度加以认识。在文化上,西方社会对哲学、饮食等中国文化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汉语是中华文明的载体,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而筷子则代表了中华的“中庸”之道;经济上,部分西方势力对“中国制造”有偏见;政治上,部分西方势力未脱离“冷战思维”的窠臼,对中国政治制度与执政党缺乏基本了解;战略上,西方国家总以己度人,用自身“国强必霸”的思维看待中国和平崛起,鼓吹“中国威胁论”。

高大伟表示,中国有着重视和平和谐的文明传统与历史实践。中国在高铁、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的同时,不依赖西方技术与平台,有着强烈的自主研发意识,取得了长足进步。他希望外派汉语教师通过民间交流,增加中西民间政治互信,带西方民众看到一个“高科中国”。

高大伟说,中国需通过软实力的提升,打破部分西方民众的认识误区。“中国梦”的构建,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意义。他就有着自己的“中国梦”。不仅中国复兴离不开“中国梦”,更要通过文化建设与传播,“让外国人梦到中国梦”。高大伟引用了《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的语句,希望外派汉语教师在对外教学中,“爱可爱,非常爱”,通过爱感动西方学生。

高大伟,知名国际关系专家,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2010年12月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曾获邀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访问学者,并受邀任教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以及欧洲、美国与亚洲各大学和国际知名跨国企业,于2002年创办“中欧论坛”。曾荣获西班牙国王授予的十字勋章与保加利亚共和国荣誉勋章,以表扬他对中欧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

国防大学唐永胜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

(通讯员:姜忆楠)2014年7月18日,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唐永胜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给南开师生带来一场题为“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主持,政府学院、历史学院等院系部分同学参加。

唐永胜教授认为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明显上升,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接着,他分别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方面对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进行了战略分析。

在他看来,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对中国产生决定性伤害的国家,美国在全球收缩的同时对中国反而更加关注,对中国小动作频频。他认为,中国处理中美关系应注重制衡与合作并重,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以增强安全依托,发展反介入、网络攻防、第二次核打击等战略能力。在中国与周边的关系方面,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很大发展,但由于美国战略调整的刺激、某些国家的投机心态以及历史原因导致的纠纷等,使得目前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还存在一些争议。唐永胜教授认为,面对此困局,中国应不断

强化在争议地区的存在,以主动开发带动合作开发,最终通过自身不断增强的影响力谋取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在法律上应坚守底线,不应为了一时的方便和平静而息事宁人。而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分析,他认为全球力量布局与国际关系的性质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地缘战略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应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避免战略冒进,谋求进一步扩大地缘优势。

在互动环节,唐永胜教授还与现场同学就中国对外政策的新变化、周边国家在中国战略选择中的定位、阿富汗问题、981号钻井平台事件、朝鲜半岛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校外短讯♣

复旦大学

●2014年5月16-17日,由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主办,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现状、前沿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思源报告厅和美国研究中心116室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欧洲等世界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北京大学

●2014年5月26日,“中国、澳大利亚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功举行。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以及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印度驻华使馆、日中经济协力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东北亚开发研究院及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与官员出席了会议。

●2014年6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与跨国问题

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以“中美在第三国合作”为题圆桌讨论。借美国卡特中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哈德曼(John Hardman)顺访学院之机,两中心邀请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大使、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高倩倩(Elizabeth Knup)女士、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杜克大学刘康教授、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培训中心何银副教授、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符晓博士等参加座谈。

●2014年7月8日,台湾研究院在北大举办“两岸关系与国际情势发展”研讨会。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淡江大学副校长兼国际研究院院长戴万钦教授分别代表北京大学与淡江大学致辞。会议围绕“两岸关系与国际情势演变”、“‘反服贸’与两岸参与区域整合”、“两岸关系与国际情势发展前瞻”三个议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清华大学

●2014年6月7日至8日,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JIP)编辑部承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角色转换与中国崛起”在清华大学甲所成功举行。来自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海德堡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所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应邀提交了会议论文或参与讨论。

●2014年7月5日至6日,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王雪莲教育基金资助的“第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年会主题为“国际关系百年变迁:反思与前瞻”。参加本届年会的专家、学者、官员、企业家、学生和媒体记者达1100余人,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德国、新加坡、波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和媒体。本次年会为期2天,共举办113场主旨论坛、圆桌会议和专题讨论,研讨范围涉及国际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的热点议题,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学术前沿。

●2014年7月7日,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JIP)编辑部主办的“中国崛起是否威胁邻国和世界”国际学术会议在清华大学甲所成功举行。来自哈佛大学、德州农工大学、马里兰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外交学院、清华大学的学者应邀提交论文和参与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

●2014年7月6日,由国内18家国际问题教研机构发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年度论坛“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论坛2014”在明德国际楼408会议室成功召开。本届论坛以“50年历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探索与争鸣”为主题,旨在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国际问题系所成立50周年。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央党校、澳门大学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50多位国内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其中包括16位高校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副院长),论坛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

●7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韩中智库协会联合举行、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六轮中美韩三方对话会议在国际楼813会议室举行。会议主旨为“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中美韩三边合作”(China-US-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与会人员就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美韩三方合作、朝核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统一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

[整理:程康、李安琪]

[责任编辑:刘志]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4年6月——2014年9月)

1. 赵龙跃:《新丝绸之路:从战略构想到现实规则》,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3期。

内容摘要:建设“新丝路”是涵盖经济贸易、金融投资、交通运输和人文科学等广泛议题的综合性区域合作倡议,是密切我国与周边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战略构想。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新丝路”建设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新丝路”战略不仅需要经贸互通和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建设,而且需要观念更新与规则构建等“软件”方面建设,以实现从“对外开放”到“塑造开放”的转变,使我国对外开放从“积极推进”发展到“自然融入”阶段,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合作

作者简介:赵龙跃,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主要从事国际经贸关系、经济全球化管理、WTO与国际贸易谈判、中美经贸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2. 吴志成、赵圆圆:《英国参与全球治理分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和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增加,英国积极倡导并有效地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安全等领域的治理,将全球治理作为维护国家利益、传播本国价值观、增强国际话语权、提高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际行动中,英国不仅凭借独特的历史遗产,延续和拓展“三环外交”,发挥了超出现实实力的影响,而且逐渐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国际地位,重视争取新兴国家的支持,表现出灵活务实的参与方式。

关键词:英国;全球治理;气候治理;安全治理

作者简介:吴志成,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赵圆圆,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硕士研究生。

3. 吴志成、袁婷:《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论析》,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

内容摘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特色的开放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发展经历了以让利吸引为主的初始探索、以互利发展为主的全面开放和以合作共赢为主的制度性开放等三个阶段。经济全球化是这一战略产生的全球经济背景,国际机制理论为其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它要求我国随着开放的扩大和自身实力的增强,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统筹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兼顾本国利益与伙伴国利益,

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国家间协调发展。坚持这一战略不仅创新我国对外开放思维,提升负责任大国形象,也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顺应了中国和平发展的需求。

关键词: 互利共赢; 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 国际机制

作者简介: 吴志成,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袁婷,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硕士研究生。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电子论文篇目信息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

1. 门洪华:《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第4-23页。
2. 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第24-41页。
3. 孙凯:《参与实践、话语互动与身份承认——理解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第42-62页。
4. 牟文富:《海洋元叙事:海权对海洋法律秩序的塑造》,第63-85页。
5. 罗国强:《东盟及其成员国关于<南海行为准则>之议案评析》,第86-102页。
6. 李晓燕:《“主体间承认”与体系内文化安全——以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为例》,第103-117页。
7. 田野:《国际政策扩散与国内制度转换——劳资集体谈判的中国路径》,第118-138页。
8. 叶静:《分散性权威与政策跨国扩散——自由贸易区在中国的设立》,第139-155页。

《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

1. 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第4-26页。
2. 张春满:《从全面去合法性到选择性嵌入:冷战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及其解释》,第27-46页。
3. 陈拯:《人性动机、战争原因与东亚身份政治——以勒博<国家为何而战?>为中心的讨论》,第47-62页。
4. 唐健:《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第63-96页。
5. 陈小鼎、王亚琪:《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话语权视角下的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第97-119页。
6. 曾向红、李廷康:《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学理与政治分析》,第120-155页。

《国际观察》2014年第3期

1. 郭树勇:《中国梦、世界梦与新国际主义——关于中国梦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第1-16页。

2. 黄枝连:《探索“中国发展—中华范式”,打造“3.0”全球化》,第17-29页。
3. 冯绍雷:《从乌克兰危机看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相互关系的前景》,第30-43页。
4. 赵可金:《中国国际战略中的金砖国家合作》,第44-58页。
5. 朱杰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第59-73页。
6. 牛海彬:《新型全球化中金砖国家的战略选择》,第74-84页。
7. 倪乐雄:《太平洋海权角逐的传统与现实》,第85-97页。
8. 甄妮:《从“消极反对”到“有限支持”:冷战后中国对待安理会制裁的应对模式变化》,第98-112页。
9. 汪波、李立:《中东地区当前的宗派地缘政治格局与冲突》,第113-127页。
10. 刘宏松:《合法性、有效性与G20机制改革》,第128-141页。
11. 毕洪业:《乌克兰的选择困境:俄罗斯还是西方?》,第142-154页。
12. 韦进深:《“乌克兰政局动荡的原因及其影响”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第155-157页。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 李巍、孙忆:《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第1-24页。
2. 王宏禹、罗洋:《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第25-40页。
3. 董洁:《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第41-58页。
4. 陈拯:《〈盐铁论〉对外关系辩论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研究》,第59-77页。
5. 石斌:《美国“黠武主义探源”》,第78-106页。
6. 潘兴明:《英国对欧政策新取向探析》,第107-120页。
7. 忻华、杨海峰:《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华决策的影响机制: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为例》,第121-138页。
8. 孙立文:《〈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及其对中国海洋争端解决的意义》,第139-159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5期

1. 林立民:《“环球高铁”建设前景及其地缘政治影响》,第1-9页。
2. 张健:《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北约转型前景》,第10-16页。
3. 耶斯尔:《阿富汗局势中的伊朗因素》,第17-24页。
4. 储召锋:《解读美国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第25-32页。
5. 孙茹:《试析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性》,第33-38页。
6. 杨恕、蒋海蛟:《“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及其影响》,第39-46页。
7. 严帅:《“独狼”恐怖主义现象及其治理探析》,第47-53页。
8. 鲁传颖:《奥巴马政府网络空间战略面临的挑战及其调整》,第54-60页。
9. 赵少峰、吕桂霞:《“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第61-62页。

《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

1. 刘赐贵:《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第1-8页。
2. 高祖贵:《亚洲整体性崛起及其效应》,第9-21页。
3. 邢骅:《欧盟东扩进入深水区》,第22-32页。
4. 金玲:《欧盟能源-气候战略:转型新挑战和新思路》,第33-45页。
5. 赵晖:《拉美区域合作与中拉合作的战略选择》,第46-58页。
6. 李成日:《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举措与影响》,第59-71页。
7. 刘作奎:《中东欧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作用》,第72-82页。
8. 徐海燕:《咸海治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契入点?》,第83-93页。
9. 杨恕、王术森:《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发展及其影响》,第94-112页。
10. 甄炳禧:《美国经济新增长点与中国的应对》,第113-130页。

《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

1. 罗艳华:《“保护的责任”:概念发展与现实问题》,第9-10页。
2. 罗艳华:《“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第11-25页。
3. 保罗·埃文斯、张卫族:《诠释与落实“保护的责任”:通往共同点的途径》,第26-33页。
4. 海泽龙:《“保护的责任”:法治良心与严峻现实——以利比亚冲突为案例》,第34-49页。
5. 顾炜:《“保护的责任”:俄罗斯的立场》,第50-60页。
6. 张旗:《道德的迷思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异化》,第61-73页。
7. 徐彤武:《当代美国非营利部门与美国国家安全》,第74-95页。
8. 宋美佳、洛水:《变动条件下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第96-109页。
9. 袁明:《中国外交在探索 and 选择中前行——评牛军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5—1955>》,第110-114页。
10. 初晓波:《罗马尼亚外交官忆中国——评<寒冰访罗明>》,第110-122页。
11. 宫崎悠、李静和:《战后德国与波兰有关历史教科书的对话》,第123-128页。

《欧洲研究》2014年第4期

1. 孔寒冰:《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的互利与互动及其前景》,第1-11页。
2. 尚宇红、高运胜:《维谢格拉德四国入盟十年对欧盟市场出口绩效分析——基于CMSA模型的实证研究》,第12-29页。

3. 孔田平:《试论欧盟扩大对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影响》,第30-48页。
4. 刘作奎:《“深化”还是“扩大”——东扩十年欧洲一体化走向分析(2004—2014)》,第49-62页。
5. 赵柯:《试论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外交与大英帝国的崩溃》,第63-75页。
6. 张晓通:《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第76-87页。
7. 王宏禹:《欧盟经济外交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第88-99页。
8. 葛建廷:《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第100-111页。
9. 宋黎磊、卞清:《新媒体时代公共外交的特征与实践——基于外交部欧洲司官方微博的案例分析》,第112-129页。
9. 张磊:《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探析——“欧洲选举”还是“次等国内选举”?》,第130-140页。

《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3期

1. 徐进、杜哲元:《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第1-32页。
2. 王铭:《唐代东北亚国家的“华夷”观念复制》,第33-85页。
3. 李少杰、赵可金:《中国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变迁》,第86-113页。
4. 巴里·布赞:《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第114-141页。
5. 刘鹏:《缅甸的民主改革与美国认可》,第142-170页。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3

1. Karisa Cloward, “False Commitments: Local Misrepresent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Against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nd Early Marriage,” pp. 495-526.
2. Michael C. Horowitz and Allan C. Stam, “How Prior Military Experience Influences the Future Militarized Behavior of Leaders,” pp. 527-559.
3. Seva Gunitsky, “From Shocks to Waves: 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561-597.
4. Jeff D. Colgan, “The Emperor Has No Clothes: The Limits of OPEC in the Global Oil Market,” pp. 599-632.
5. Idean Salehyan, David Siroky and Reed M. Wood, “External Rebel Sponsorship and Civilian Abuse: A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of Wartime Atrocities,” pp. 633-661.
6. Leslie Johns and Krzysztof J. Pelc, “Who Gets to Be In the Room? Manipulating Participation

in WTO Disputes,” pp. 663-699.

7. Stephanie J. Rickard and Teri L. Caraway,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n the Shadow of National Elections,” pp. 701-720.

8. K. Amber Curtis, Joseph Jupille and David Leblang, “Iceland on the Rocks: The Mass Political Economy of Sovereign Debt Resettlement,” pp. 721-74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8, No. 3

1. Daniel Carpenter and Colin D. Moore, “When Canvassers Became Activists: Antislavery Petitioning and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American Women,” pp. 479-498.

2. Richard L. Fox and Jennifer L. Lawless, “Uncovering the Origins of the Gender Gap in Political Ambition,” pp. 499-519.

3. Rainbow Murray, “Quotas for Men: Reframing Gender Quotas as a Means of Improving Representation for All,” pp. 520-532.

4. John T. Scott, “The Illustrative Education of Rousseau’s *Emile*,” pp. 533-296.

5. Krzysztof J. Pelc, “The Politics of Preced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A Social Network Application,” pp. 547-564.

6. Scott Ashworth and Ethan Bueno De Mesquita, “Is Voter Competence Good for Voters? : Information, Rationality, and Democratic Performance,” pp. 565-587.

7. Anna Getmansky and Thomas Zeitzoff, “Terrorism and Voting: The Effect of Rocket Threat on Voting in Israeli Elections,” pp. 588-604.

8. Chris Tausanovitch and Christopher Warshaw, “Representation in Municipal Government,” pp. 605-641.

9. Jeremy Ferwerda and Nicholas L. Miller, “Political Devolution and Resistance to Foreign Rule: A Natural Experiment,” pp. 642-660.

10. Daniel W. Hill, JR. and Zachary M. Jone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Explanations for State Repression,” pp. 661-687.

11. Guy Grossman, Macartan Humphreys and Gabriella Sacramone-Lutz, “‘I wld like u WMP to extend electricity 2 our villag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rest Articulation,” pp. 688-705.

12. Xiaobo Lü and Pierre F. Landry, “Show Me the Money: Interjurisdiction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Fiscal Extraction in China,” pp. 706-722.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3

1. Lee J. M. Seymour, “Let’s Bullshit! Arguing, Bargaining and Dissembling over Darfur,” pp.

571-593.

2. Claudia Aradau and Jef Huysmans, "Critical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s of Techniques, Devices and Acts," pp. 596-619.

3. Jonathan W. Kuyper, "Global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 Complexity," pp. 620-646.

4. Duncan Bell, "Before the Democratic Peace: Racial Utopianism, Empire and the Abolition of War," pp. 647-670.

5. Garrett Wallace Brow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Kant's Idea of Cosmopolitan Right: Why the EU is Not Cosmopolitan," pp. 671-693.

6. Jonathan Gilmore, "Protecting the Other: Considering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Cosmopolitanism," pp. 694-719.

7. Ty Solomon, "The Affective Underpinnings of Soft Power," pp. 720-741.

8. Bernd Bucher, "Acting Abstractions: Metaphors,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the Eclipse of Agency," pp. 742-765.

9. Andrew A. Latham and James Christenson, "Historicizing the 'New Wars': The Case of *Jihad* in the Early Years of Islam," pp. 766-786.

10. K.M. Fierke, "Who is My Neighbour? Memories of the Holocaust/*al Nakba* and A Global Ethic of Care," pp. 787-809.

11. Michal Ben-Josef Hirsch, "Ideational Chang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Norm o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s," pp. 810-833.

12. Joseph O'Mahoney, "Rule Tens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to the Victor go the Spoils' to the Stimson Doctrine," pp. 834-857.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1

1. Ja Ian Chong, Todd H. Hall, "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 Miss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 pp. 7-43.

2. Etel Solingen, "Domestic Coalition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War: Then and Now," pp. 44-70.

3. Jack Snyder, "Better Now Than Later: The Paradox of 1914 as 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 pp. 71-94.

4. Tanisha M. Fazal, "Dead Wrong? : Battle Deaths, Military Medicine, and Exaggerated Reports of War's Demise," pp. 95-125.

5. Jerry Mark Long, Alex S. Wilner, "Delegitimizing al-Qaida: Defeating an 'Army Whose Men Love Death'," pp. 126-164.

6. Liam Anderson, "Ethnofederalism: The Worst Form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pp. 165-204.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2

1. Paul C. Avey and Michael C. Desch, "What Do Policymakers Want From Us? Results of a Survey of Current and Former Senior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akers," pp. 227-246.
2. Brandon J Kinne, "Dependent Diplomacy: Signaling, Strategy, and Prestige in the Diplomatic Network," pp.247-259.
3. Jeremy Caddel, "Domestic Competition over Trade Barriers in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pp. 260-268.
4. Laura Gomez-Mera and Andrea Molinari, "Overlapping Institutions, Learning, and Dispute Initiation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Evidence from South America," pp. 269-281.
5. Damian Raess, "Export 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age Bargaining in Germany," pp. 282-294.
6. Tobias Pfitze, "Clientelism Versus Social Learning: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p. 295-307.
7. Hye Jee Cho, "Impact of IMF Programs on Perceived Creditworthiness of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Is There a 'Nixon-Goes-to-China' Effect?," pp. 308-321.
9. Karolina M. Milewicz and Manfred Elsig, "The Hidden World of Multilateralism: Treaty Commitments of Newly Democratized States in Europe," pp. 322-335.
10. Brian J. Phillips, "Terrorist Group Cooperation and Longevity," pp. 336-347.
11. 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 and Teale N. Phelps Bondaroff, "From Advocacy to Confrontation: Direct Enforcement by Environmental NGOs," pp. 348-361.
12. Darin Christensen and Erik Wibbels, "Labor Standards, Labor Endowment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equality," pp. 362-379.
13. Jonathan K. Hanson, "Forging then Taming Leviathan: State Capacity, Constraints on Rulers, and Development," pp. 380-392.
14. Matthew S. Winters, "Targeting, Accountability and Capture in Development Projects," pp. 393-404.
15. Stephan Haggard and Lydia Tiede, "The Rule of Law in Post-Conflict Settings: The Empirical Record," pp. 405-417.
16. Halvard Buhaug, Lars-Erik Cederman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Square Pegs in Round Holes: Inequalities, Grievances, and Civil War," pp. 418-431.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8, No. 6

1. Daniel Mirza and Thierry Verdier, "Are Lives a Substitute for Livelihoods? Terrorism, Security, and US Bilateral Imports," pp. 943-975.
2. Daina Chiba, Carla Martinez Machain, and William Reed, "Major Powers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 pp. 976-1002.
3. Christopher J. Fariss and Keith E. Schnakenberg, "Measuring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State Repressive Actions," pp. 1003-1032.
4. J. Tyson Chatagnier, "Teaching the Enemy: The 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Bargaining under Observation," pp. 1033-1058.
5. Kenneth A. Schultz, "What's in a Claim? De Jure versus De Facto Borders in Interstate Territorial Disputes," pp. 1059-1084.
6. Molly M. Melin and Alexandru Grigorescu, "Connecting the Dots: Dispute Resolution and Escalation in a World of Entangled Territorial Claims," pp. 1085-1109.
7. Eran Halperin, Ruthie Pliskin, Tamar Saguy, Varda Liberman, and James J. Gross,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olitical Tolerance: Searching for a New Track for Intervention," pp. 713-740.

Security Studies, Vol. 23, No. 3

1. Daniel Byman, "Buddies or Burdens? Understanding the Al Qaeda Relationship with Its Affiliate Organizations," pp. 431-470.
2. Austin Long, "Whack-a-Mole or Coup de Grac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Target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pp. 471-512.
3. Andrea Gilli and Mauro Gilli, "The Spread of Military Innovations: Adoption Capacity Theory, Tactical Incentives, and the Case of Suicide Terrorism," pp. 513-547.
4. Joshua Rovner and Caitlin Talmadge, "Hegemony, Force Posture,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The Once and Future Role of Outside Powers in Securing Persian Gulf Oil," pp. 548-581.
5. Chiara Ruffa and Pascal Vennesson, "Fighting and Helping? A 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NGO-Military Relations," pp. 582-621.
6. Ryan Grauer, "Why Do Soldiers Give Up? A Self-Preservation Theory of Surrender," pp. 622-655.

World Politics, Vol. 66, No. 3

1. Timothy Frye, Ora John Reuter and David Szakonyi, "Political Machines at Work Voter Mobilization and Electoral Subversion in the Workplace," pp. 195-228.
2. Rafaela M. Dancygier, "Electoral Rules or Electoral Leverage? Explaining Muslim Representation in England," pp. 229-263.

3. Alex Street, "My Child Will Be a Citizen: Intergenerational Motives for Naturalization," pp. 264-292.
4. Ryan S. Jablonski, "How Aid Targets Votes: The Impact of Electoral Incentives on Foreign Aid Distribution" pp. 293-300.
5.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Domestic Institution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Charting the New Interdependence Approach," pp. 301-363.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4

1. James Pattison, "Justa Piratica: the Ethics of Piracy," pp. 631-656.
2. Rebecca Adler-Nissen, "Symbolic Power in European Diplomacy: the Struggle between National Foreign Services and the EU's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pp. 657-681.
3. Florian Schneider, "Reconceptualising World Order: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It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683-703.
4. Leonie Holthaus, "L.T. Hobhous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pp. 705-727.
5. Thomas Richard Davies,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ism,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Robert Owen," pp. 729-751.
6. Vincent Charles Keating and Jan Ruzicka, "Trusting Relationship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 Need to Hedge," pp. 753-770.
7. Catherine Goetze and Berit Bliesemann de Guevara,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Peacebuilding," pp. 771-802.
8. Matthieu Chillaud, "IR in France: State and Costs of a Disciplinary Variety," pp. 803-824.

[整理: 董柞壮、于凯玥、李安琪]

[责任编辑: 李安琪]

读编往来

【编者按】国关系刊《新视界》自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开拓国关人的视野，展现国关人的风采。在往期的读编往来栏目中，小编收到了许多来自老师和同学的祝福与建议。在本期的读编往来中，小编也会选取几封热心读者的来信，与大家一起分享对于阅读的心得和对于系刊的建议。

读者言论



唐朝阳(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读《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让我实际地看到了国际政治中权力的存在。影响力，在该文作者看来其并不仅仅是权力和实力的代名词，作者更多关注的是它的丰富内涵，这其中包括影响力的主要维度、评判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准以及实现影响力的主要路径。这些“丰富的内涵”被作者包含在了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的含义之中，即认识和评判他的手段等同于其部分概念。这种观点，是否是作者在尽量避免自己落入前人的窠臼而让自己显得富有创造性呢？实际上，国际政治中理论分析工具并不少见，现如今，任何社会科学都掺杂了理性分析工具的阴影。社会科学被理性的分析，似乎使其脱离了感情之外，或者认为理性本身能够成为感性认知的尺度。

理性认识所产生的国际政治的诸多模式并不代表国际现象的全部，政治的产生基础依旧是人的社会活动，而人的社会活动是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之上的，并不是简单的理性思维模式。这点，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杨至远(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上期《国关人物》的主角是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中研究中国问题的新生代学者代表江

忆恩，他主要从古代中国的战略文化、当今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未来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与难题三个方面展现了其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研究成果。我想就第三个部分即未来中国外交的挑战与难题进行简单的分析。

我认为，虽然在文中江教授运用了安全困境并且结合中美之间的对比对于中国在未来崛起的不可预测性进行了论述，但是综合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以及经济实力的发展，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相对与绝对的差异会不断缩小，虽然漫长但是中国的崛起在本世纪将会有一个大致的成型轮廓。而对于中国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国际事件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公众舆论方向的改变，我认为中国自身需要加大管控的力度，而国外对于此类问题也应该采取一种相对包容的态度，这样才有助于中国尽快自我消化此类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中国模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都是为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创造一个真正安定的社会，从而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黄灏(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夏季号时事观察栏目的主题是对于越南反

华的分析,这一事件在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结合最近的新闻不难发现,随着越南排华浪潮的逐渐消退以及有关各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的有效开展,各种事态已经逐步进入了善后的局面之中,新闻头条也开始较大篇幅地报道越南对于受到冲击的华人企业的赔偿以及振兴旅游业的问题,这对于中越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好的现象。回顾几个月来的越南反华浪潮的兴起、扩展与消退,不难看出,国家利益与国家力量在双方的博弈之中所产生的巨大效果。虽然越南有着美国等西方势力在背后的撑腰,而且其态度相较之中方来说也显得比较激进,但是中方凭借日益增强的国力与之进行有理有据的交涉,结合必要的武力,最终在这场国际博弈之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为之叫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阻碍我国发展的潜在力量对于亚太的威胁还远远没有消除,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

唐铭兴(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近来仔细阅读了《新视界》这最新的夏季号,个人觉得这里面的文章还是很有质量的,作为一个即将步入大三的学生,我对该期《新视界》中的《关于保研的那点事儿》很感兴趣,在该篇文章中,作者对于保研的事阐述的很详细,对于我们这些即将面临保研、考研或者出国的这些同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文章中,作者将保研的条件、过程、经验等都很详细地说给我们听了,从整个的保研条件,到具体的面试技巧,作者都有很认真地阐述给读者,其中,具体的准备过程更是让我获益匪浅,这对于我们这些还不是很明白状况的学生还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也在文章最后勉励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要好好努力,为保研做出准备,我也觉得对于想要保研的同学们而言,真的很有必要好好准备了。最后,祝《新视界》越办越好,成为服务师生的好帮手。

小编总结

十分感谢几位同学的来信,你们的支持和关注正是《新视界》不断发展的动力。小编希望能够在系刊上更多地看到大家的文字,将你们对于系刊、对于国际关系的思考

与建议传递给我们,也分享给更多的人。在未来的路上,希望《新视界》能够一直陪伴你们。

《新视界》信箱:

把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对我们改善栏目的建议,以及希望得到我们解答的疑惑,发给我们吧!来信请发: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我们将尽可能迅速和详细地回答你的提问。

[整理:杨至远、李 漩]

[责任编辑:李 漩]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01 页。

2. 编著: 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0-68 页。

3. 译著: 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 在文献名之后, 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 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 如为三人以上, 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 《旧邦新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 《欧洲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 《开放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9 页。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著者, 文章题目(加书名号), 文集编者名称,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 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 《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 《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9-117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15-17日，第3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5. 报纸

刘丰：《联盟政治研究的进展与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6日，第B03版。

（三）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 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有作者注明作者，没有则注明文题即可。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0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09年
12月14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 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 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 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 《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第165-176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年版。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 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 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 首行缩进2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 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 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4): 1151-1169.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 10000 字以内为宜。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并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